

# 全球策略信息

第9卷第1期 1998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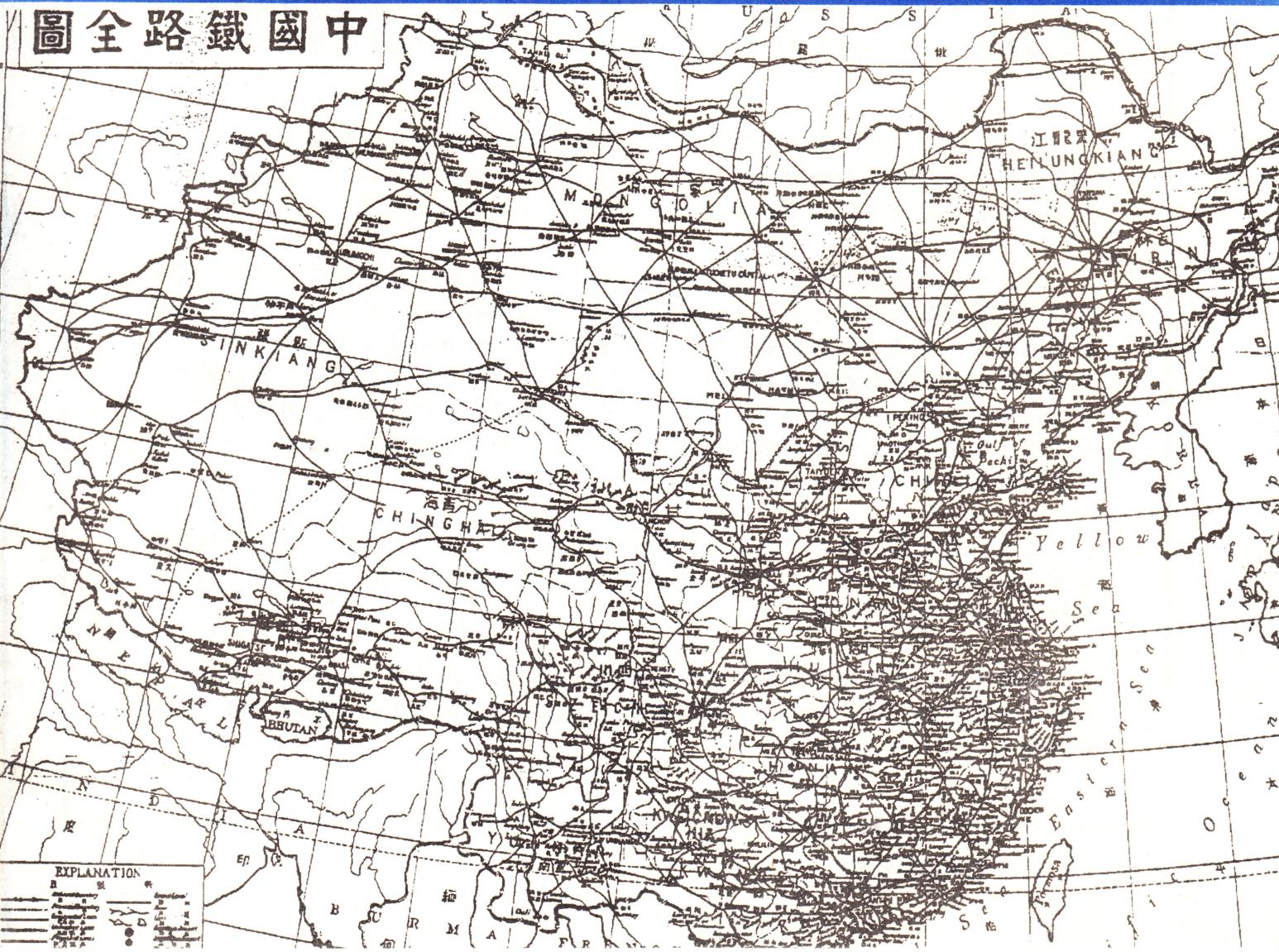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中心金融危機金融一個新階段

中心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政”

即將來臨的大陸橋文明紀元：  
拉魯旭、孫中山與中美新夥伴關係

中國鐵路全圖



## 編者按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美國政治家、<<EIR>>的創始人林登·拉魯旭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講。與會者包括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大使館的代表，主要外國媒體（尤其是亞洲國家的媒體）的代表和美國的決策者。

拉魯旭在這篇即將全文發表在三月二十七日<<EIR>>上討論了這場從亞洲蔓延到歐洲而最終將蔓延到美國的金融危機。他強調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目前為應付這場危機而執行的政策實際上是在摧毀這些亞洲國家。拉魯旭說，為對付這場金融危機而將計劃在四五月間舉行的一系列會議具有重要的意義。由美國財政部長拉賓呼籲在四月十六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二十二國會議必須討論三項關鍵的議題：

第一，以美國為首的這二十二國必須承認這場危機是一場全球性的系統危機，必須認識到產生這場危機的原因是當年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

第二，這些國家必須一致同意對貨幣體系進行徹底重組，切實實施破產重組，重新采用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資本流通控制，採取必要的保護主義措施，廢棄貨幣投機市場。

第三，這些國家的代表必須明白，全球經濟目前正處在負增長階段，其人平實物產出低於維持世界人口增長的需求。因此，他們必須一致採取振興實物經濟的政策，類似當年羅斯福總統採取的政策，只是把這些政策推向全球。

三月十八日的華盛頓會議是拉魯旭及其同事們採取的一系列國際行動的先導，在這之後還將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首都舉行類似的會議，目的是讓金融體系回到堅實的基礎上，這樣才可以開始進行真正的經濟重建。經濟重建的關鍵是採納拉魯旭的機床原理：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機床生產領域，由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把科學發現轉化為機床設計，從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機床領域，如果不回到傳統的教育體系，如果不發揮國家在發展基礎設施方面的作用，實物經濟將無從談起。

從這一角度出發看看中國宏偉的歐亞大陸橋計劃。去年，新絲綢之路的發展取得重大的進展，如去年十二月竣工的從中亞土庫曼斯坦到伊朗的天然氣管道和中俄兩國最近舉行的一系列會談。

源自于機床原理的大陸橋不僅對亞洲的經濟未來，而且對全世界的經濟未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問題是：政策制定者們能否及時的採取拉魯旭呼籲的這些積極措施？

# 全球策略信息

第9卷第1期 1998年3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 中心金融危機金融一個新階段
- 中心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政”
- 中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唯一問題
- 即將來臨的大陸橋文明紀元：拉魯旭、孫中山與中美新夥伴關係
- 中美鋼產量對比：兩種理論 兩個結果
- 土庫曼伊朗天然氣管道：歐亞大陸橋建設之進展

## 本刊自述

與72頁厚的英文《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執行策略評論），簡稱EIR》相比，《全球策略信息》只是一個小小的文選。《執行策略評論》由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創刊于一九七四年。其新聞取自該刊遍及五大洲的專有渠道而不依賴任何有線服務。因其特立獨行的風格以及深入透徹的分析和計劃，《執行策略評論》常被一些政府當做獨立的諮詢顧問。又因《執行策略評論》不依賴替大公司或金融利益集團做廣告為經濟來源，所以《執行策略評論》編者的見解才能夠非但保持完全獨立而且常會引起爭議。

除了是月刊和頁數較少之外，中文的《全球策略信息》在所有方面都儘可能地照搬《EIR》原本，如戰略、歷史和經濟方面的分析等等。這些肯定是在任何其它的中文報刊裡找不到的！我們出版《全球策略信息》之目的不是為了求名得利而是為了給讀者一些政、經、文方面的思想指導以利于創造和發展一個新的文藝復興式的未來。

歡迎您向本刊提意見或建議。中文《全球策略信息》編輯部在美國新澤西州。函件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見封底訂閱單。

美國EIR（全球策略信息）  
c/o H.S.D.I.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Tel: (201)-641-8858  
Fax: (201)-641-0453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

歐洲 c/o EIR  
Nachrichtenagentur  
GmbH, Postfach 2308  
D-65013 Wiesbaden  
Germany  
Tel: (6122) 9160

# 中心進入危機進入一個新階段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力阻止“南亞”崩潰

陸琳灘 (Leni Rubinstein)

三月十一日 (EIRNS) —— 具有傳奇意義的三月上半月即將過去，那些世界金融泡沫的投資者應該警惕。新一階段的崩潰已經開始在南亞發生，這將在國際衍生金融交易市場上產生反響，并影響到即將來臨的日本三月三十一日政府改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最後的國際出借機構，已經證明無力阻止這一危機，而且，還對接受其“援助”的國家帶來毀滅性的效果。

最先發出這一嚴重警告的是國際清算銀行，它在一九九七年第四季度的國際銀行金融市場發展報告中專門加進了“亞洲貨幣危機”一章。國際清算銀行承認，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措施，還是它提供的五百七十億美元援助，都無法阻止南韓這一危機中心的貨幣暴跌。而且，國際清算銀行還預言，由於多年來在亞洲貨幣上的“巨額舉債投機”，巨大的損失將很快出現。

據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干事康德蘇于三月九日在華盛頓的一次午餐會上說，到目前還未能解決印度尼西亞的危機，這使整個金融體系處於“危險狀況”之中。

危機的深化應該激起人們探討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貨幣體系，這已經開始進行。應美國呼吁，二十三個國家將於四月在華盛頓開會。世界各國的財政部長們已經開始談論建立一個“新結構”和進行資本流通控制的需要，以防止掠奪性投機所帶來的打擊。實際上，世界所需要的正是美國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提出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

### 印度尼西亞的危機

目前，危機的焦點是印度尼西亞。最近再次當選的蘇哈托政府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其提供數百億美元“援助”的條件。蘇哈托總統三月九日在會見議會議員時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無法穩定

國家的貨幣，而且違反了印度尼西亞一九四五年憲法的第三十三條。憲法三十三條的部分文字如下：“對國計民生至關重要的生產部門必須由國家控制。土地、水和自然資源必須由國家控制并用于最大限度地促進國家的繁榮興旺。”

蘇哈托在先前還斷然否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他提出過任何成功的解決方案。

蘇哈托總統說，事實上，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在企業倒閉和物資匱乏下掙扎，這已沖銷了印尼在過去二十年中取得的所有成績。盡管從技術上說禁止示威游行，但是反對蘇哈托總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學生示威還是天天發生。食品短缺，貨幣（盧比）暴跌。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指望盧比穩定在五千盧比對一美元的水平，但是現在已達到一萬盧比以上。

由於政府拒絕接受所有的條件，如拒絕放開對食品供給的管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暫停對印度尼西亞的下一步筆三十億美元的援助。緊隨之後的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也決定暫停撥款，據說日本也是這樣。一個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團計劃下周訪問美國，

但是，最壞的事情可能還在前面。<<華爾街日報>>三月九日報道，印度尼西亞最大和最保守的一家銀行正面臨巨大的衍生金融交易損失，這些損失必須在下月付清，但是很有可能根本無法付清。

### 其它熱點

泰國或南韓雖然沒有明顯的政治鬥爭，但是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這兩個國家被迫向國際海盜開放，執行大大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大量的債務，尤其是私人債務，完全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無法通過經濟緊縮來解決。

日本的情況更加危險，幾家大銀行的信用等級降低，所有銀行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三月三十一日融資規

定改革。日本政府雖說還在繼續向外提供援助基金，但事實上由於日本金融體系在投機風潮中的上下顛簸，其債務已經成為一個無底洞。

## 拉魯旭：無法繼續下去了

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三月十一日在“EIR訪談”的電台廣播中被問到這場危機時這樣說到：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請記住…我們正處在三月的最後幾周，這也是本年最初一個季度的終結。在一些國家中，這一時節具有財政意義。人們必須結賬，以便把他們本年度第一季度的賬目和財政報告上報。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把賬本上的虛假資產去掉，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現實。這將很令人難堪，就像現在的日本一樣。

由於這一原因和帶有類似性質的其它原因，你將看到一段極不穩定的時期，即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這段時間。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基本上相當於當年的凱撒和街頭著名預言家所說：‘警惕三月上半月。’，我們就處在這三月的上半月。

這個體系已沒有穩定可言。它已經徹底爛掉了。我們還在大量增加銀行的折現率，即增加M3的發行量。我們還在向全世界的金融體系注入資金，以提高股票市場價值。”

拉魯旭繼續說，現在也存在著通過政治協議來克服這場危機的機會。但這一體系的根基已經爛掉了。或遲或早它總會炸開，最好是向拉魯旭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方向發展。

## 中心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政”？

喬納森·騰能堡姆（Jonathan Tennenbaum）

喬納森·騰能堡姆報道，中國決定在今後三年內斥資一萬億美元發展基礎設施

中國副總理李嵐清在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三日于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一舉揭開籠罩現實的迷霧，宣布中國將在今後三年內斥資七千五百億美元發展國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這樣，中國抵消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保持其高經濟增長率，為由於國有企業改革而產生的失業工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李嵐清講話的要點已經在三月五日開幕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的立法機構）的系列新聞報道和對中國官員的採訪中得到證實。而且，會上還提到更高的投資額：一萬億美元。這是羅斯福總統三十年代著名“新政”的現代中國版的核心。

比如，共產黨上海市委副書記黃啟凡在接受《國際先驅論壇報》三月六日的採訪時說，中國領導人認為，為了保持高增長率和避免大規模失業，投資一萬億美元是必要的。這些投資將用于興建道路、橋梁、電廠、污水處理設施、水利工程和農業發展。

發表在二月十九日香港《南華早報》上的另一篇文章引用“黨內人士”的話說，李鵬總理的繼任者朱熔基已經在研究以發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住宅工程為刺激中國經濟的關鍵措施。這一消息來源說，“就其深度和廣度而言，這一振興計劃可以與羅斯福的新政相比。”

毋容置疑，這些報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除了贊揚之詞甚至來自某些不諧和角落的贊揚之詞以外，中國的宣布也引起了許多懷疑，甚至是惡意的攻擊。中國人是在說大話嗎？他們從哪里籌集資金？最大的奇談怪論來自于塞格弗來德·塞爾比爾（Siegfried Thielbeer），他在德國大報《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中國的新政”。文章自稱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證明，提出的投資額毫無意義，中國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根本談不上再投資七千五百至一萬億美元。

無論塞爾比爾個人的奇談怪論如何，他的論點是精神錯亂的一派胡言，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陳詞濫調，不幸的是，也是當今多數國家政府信奉的經典。對專長于攻擊中國“違反人權”的塞爾比爾來說，十二億人民的未來顯然要由簿記人員的統計來決定。

## 中心從生存需求入手

塞爾比爾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領導人與當今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不同，他們對這些問題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們不是從統計數字出發，而是從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生存需要出發。在現今的情況下保證中國的生存，無疑是一場戰爭；沒有其它的道路可以獲勝。因此，當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中國的生存需要某些東西時，他們會盡全力去保障這些東西的生產。如果資金不夠，他們將要麼直接增加貨幣發行（這是每一個主權國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要麼通過間接方式來取得需要的結果。

<<EIR>>最近一段時間與中國經濟學家進行了討論。這些討論揭示出一種概括性的但也是前後一致並且可信的理論思維，最近的這一系列宣布就是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形成的。

顯然，中國政府正在非正式地使用“新政”這一術語，以此指通過大規模投資發展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來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思想。

這一政策將成為一種充滿動力的創造。在目前，還沒有確定的計劃，沒有具體的籌資計劃。現在有的只是中國必須走的大致道路。

中國政府並不打算通過國家預算直接為如此龐大的建設計劃提供資金。但是政府可以通過多重渠道大力刺激投資，如為一些重大工程提供資金，發行債券，動用全民的儲蓄，增加信用發放能力，提高國有銀行體系的效率，讓財政政策向國家的內陸地區傾斜等等。這無疑將包括運輸、能源和水利設施。

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我們或遲或早都必須完成這些項目。那麼為什麼不現在做呢？”

最壞的情況是：外國投資和出口收入將由於全球金融危機而完全消失。看看中國最近的政策聲明和其它的跡象，中國領導人現在認為這種崩潰是一個現實的可能，并因之而重新考慮其經濟戰略。中國的國內市場具有很大的吸收能力和增長潛力。沿海發達地區為何不能投資於內陸地區的發展呢？

## 中心無數潛在的發展項目

我還願意提供下述背景材料。中國實際上具有無數潛在的機會來發展交通運輸、能源和水利基礎設施，這些項目的實現將大大有助于實物經濟的發展。比

如，加快歐亞大陸橋沿線的“發展走廊”建設，開發大陸橋沿線的中國中部和西部的豐富自然資源，興建南水北調工程和灌溉設施以發展中國北部的農業，改善全國的水運體系，發展長期以來一直交通閉塞的內陸農業地區的鐵路和公路，建設新城以加快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為現有大城市興建現代化的高速運輸體系（到二〇〇〇年，中國將有一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中，而這些城市到今天為止幾乎都沒有地鐵系統）。這些項目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具有巨大的價值；它們將成為漢密爾頓“無通漲國家信用”模式的應用典範。

從實物經濟上看，中國擁有充分的可開發人力資源、生產能力、原料以及在沒有外來幫助情況下依靠自身力量大力發展基礎設施的能力。當然，進口一些先進的機器和技術將大大有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就此而言，中國可以更好地利用其龐大的外匯儲備（一千三百九十億美元）和目前的出口收入。中國建築行業的興旺已經為數百萬來自農村的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和一定程度的工業技術。目前，這些建築項目大多是非生產性的工程，如辦公樓、賓館、百貨大樓等等。如果把這些物力資源用于發展內陸地區的開發項目，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大得多的實際利益。

一些評論家在評論正在進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指出了繼續採取緊縮財政政策的跡象，并以此反駁“新政”思想。但是必須明白，中國政府不能簡單地向經濟注入新資金。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和資金向無效和投機方向流動，投資必須在高度控制和嚴密紀律下進行。緊縮財政的表象和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政”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矛盾。

未來幾周和幾月之間，在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之後，人們將會對新政策的綱要有更清楚的認識。在本文作者看來，有三大問題特別值得關注：一、中國政府將如何動員人民投身於這場新發展？二、中國的“新政”是否包含根據林登·拉魯旭“機床原理”而產生的關鍵部門發展計劃？這必須包括大大加快核能工業（尤其是高溫反應堆技術）的發展并以之作為中國經濟的“火車頭”。三、盡管中國很大而且採用了很多保護性政策，但是中國不能像一個島國一樣在世界經濟全面崩潰的混亂中長期安然無恙。中國是否採取主動行動，與其它國家一道對世界金融體系進行“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式的改造，從而讓世界許多國家恢復基本的經濟理智？

# 中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唯一問題

威廉·恩格戴爾 (William Engdahl)

從亞洲開始蔓延的這場金融貨幣危機中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危機中的作用。它的衛道士們聲稱，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這場發源于泰國、後來又蔓延到印度尼西亞和南韓的危機迅速做出的反應，這場亞洲危機可能已經演變成後果無法估量的全球系統危機。但是認真觀察一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的作用和這一重大超國家機構的歷史演變過程，可以得出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它一無是處。它必須解散，必須為一個全新的組織所取代，而這一組織必須建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人平經濟實力的基礎之上。

自一九九七年五月泰國貨幣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頭組織了一千二百億美元的緊急救援資金，企圖遏制恐慌，防止危機引發全球系統危機。到本文發表之時，救援不僅沒有奏效，而且引起災難性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條件”藥方，實際上不僅沒能治病，而且幾乎殺死病人。現在又威脅要讓全球脆弱的金融體系同歸于盡。

一月十三日，一份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干事康德蘇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準備的機密備忘錄的細節泄露出外。該備忘錄的詳細摘要指出，在印度尼西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把一個困難的局面惡化成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而這又威脅到重新在亞洲和其它地區引發一輪混亂。

## 印度尼西亞的災難

去年十月，當大多數人仍舊愚蠢地認為亞洲危機還不至于造成對全球的威脅時，設于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命令關閉印度尼西亞十六家資不抵債的銀行，其中包括一家蘇哈托總統兒子所擁有的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的論點是：必須採取這一步驟來“恢復”人們對印度尼西亞金融體系的信心。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份機密備忘錄所說，這一步

驟引起一片恐慌，成千上萬的印尼人出于擔心，排隊從所有印尼銀行中擠兌現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備忘錄承認了這一事實。“這些銀行的關閉並沒有提高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相反還重新引起一場，逃往安全地帶，的風潮。”備忘錄提到，印尼人在宣布銀行關閉的幾天之內就突然擠兌出足以讓印尼癱瘓的二十億美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備忘錄，到十一月底，三分之二的印尼銀行“儲蓄額嚴重流失，”從而引發危機。局勢的嚴重性迫使印尼中央銀行向其銀行體系注入巨額資金，以防止全面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備忘錄說，這筆資金“相當於過去兩個月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這筆資金的流失反過來又進一步削弱了印度尼西亞貨幣，引起十二月底的貨幣恐慌，使印度尼西亞幾乎喪失了獨立解決問題的前景。

為了給亞洲危機火上加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責令印度尼西亞、泰國以及規模大得多的南韓經濟採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正統藥方，以換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救援資金。這就是削減財政赤字，控制通貨膨脹，關閉脆弱銀行，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砍掉國家對食品、燃料和其它必需品的價格補貼。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得到三百九十億緊急援助的七項條件：把通貨膨脹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但又要防止經濟衰退；把國家財政預算赤字降到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得百分之一（德國是百分之三）；把預算外地特別政府支出納入預算之內；取消許多“浪費性的”公共工程；中央銀行成為獨立的貨幣決策機構，使之可以提高利率到保護印尼貨幣所需要的程度；解散行業組織，如木材行業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七個條件與印度尼西亞的真正貨幣危機完全沒有關係。實際上，這些條件一旦實施，將加劇貨幣危機，使經濟墮入嚴重的衰退，削弱以前已經建立起的硬通貨出口行業。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造成的早期銀行恐慌之後。

貨幣崩潰反過來又引發全面的外債危機，因為國內銀行和公司發現，在短短的幾周之內，印尼貨幣幣值與去年八月比較下降百分之八十四。

與八十年代債務危機中不得不投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的墨西哥和其它拉美國家不同，東亞國家在危機突然於去年爆發之時並沒有內在的問題。它們沒有曠日持久的預算赤字，沒有長期的通貨膨脹，更不用說什麼超通貨膨脹了。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不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大多數債務不是國家債務（這與阿根廷和巴西不同），而是私人債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麼如此愚昧無能？這並不偶然，也不是一時的忽略。它多年以來一直在盡力維護它的無能。

## 從布雷頓森林開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當今世界上勢力最大的金融機構，也是鮮為人知的機構。它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在新罕布什爾布雷頓森林召開的會議的產物。這次會議由羅斯福總統主持召開，目的是為戰後經濟重建準備基礎。有四十四個國家和美國一道簽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運作。每一成員國向位於華盛頓的中央基金交納一定準備金，以保障其成員國在戰後贏得信心。在特殊情況下，基金將根據一致同意的條件向有需求的成員國提供貸款。

為提供緊急貸款設立的臭名昭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在五十年代末最終形成一套僵硬的條款，直到今天仍舊生效。在過去四十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上培養和招募了大批在思想上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和這一正統貨幣主義主張的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受援國必須讓該組織的檢查人員相信，它正在執行“以一種現實的匯率建立或保持貨幣長期穩定”的政策。所謂“現實的匯率”當然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定。在關鍵的匯率問題上進行控制，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控制一個國家的財政政策，政府開支，稅收政策和公立企業政策。一言以蔽之，控制國民經濟的每一方面。然而，正如亞洲危機所證明的那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法控制勢力龐大的保值期貨投機商，如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正是他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把貨幣市場搞得天翻地覆。

基金的出借采用一種“分期觀望安排”，而不是一筆付清。這就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以對受援國進

行控制，迫使受援國要麼吞下猛藥，要麼失去貸款中的剩餘款項。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說，這一方法增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力量，使之得以誘使受援國“更積極地執行保持貨幣穩定和寬松還款條件的政策”。也就是說，嚴格控制信用，貨幣完全自由兌換。這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正是這些條件導致亞洲今天的滅頂之災。

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成員國，也是戰後最大的黃金儲備國，在貨幣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最大。因此，它最初擁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五的表決權。今天，雖說它仍然擁有最大的份額，但其表決權已降到百分之十七點八。

英國和其它五個最初屬於英聯邦和大英帝國的基金創始國，印度、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第二大集團，最初擁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基金表決權。這一舉足輕重的表決力量是英國首相邱吉爾和代表皇家金庫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向美國施壓的結果。邱吉爾和凱恩斯爭辯說，英國龐大的殖民帝國應該具有這樣的影響力，盡管英國自身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間整個國家已經陷于破產。與之相比，當時也可以吹噓擁有大片殖民地的法國卻只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百分之五的表決權。這說明邱吉爾的大西洋“特殊”關係在一九四四年仍然很有市場。

## 追查哈里·德克斯特·懷特 ( Harry Dexter White )

為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準備的文件，是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兩大參加者激烈爭辯的結果，這就是由代表美國的財政部副部長懷特和代表英國的凱恩斯。最後，凱恩斯不得不向美國做出重大讓步，接受懷特起草的方案。這一方案最初建議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和羅斯福總統建立一個穩定基金，以防止三十年代出現的那種貨幣危機。懷特穩定基金方案的初衷是與重建開發銀行一道，向戰後的世界尤其是西歐提供長期重建美元貸款。這兩套計劃後來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基礎。

凱恩斯的計劃則與之不同。他主張建立一個清算聯盟和新的超國家貨幣，他稱之為“尤尼塔斯”。

五十年代初，麥卡錫在美國煽起“紅色恐怖”風潮。懷特被指控為“共產黨同情分子”，甚至被指控為共產黨特務。這損害了懷特按美國條件進行布雷頓



“1944年美國財政部長莫金鎖在  
卜瑞騰物資國際貨幣會議開幕式  
上講話。”

森林談判的地位，也損害了他後來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的作用。所有後來的證據表明，懷特是基于當時美國的立場進行談判的，目的是建立在當時是適宜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符合羅斯福總統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的戰後世界的主張。

考慮到後來披露出來的倫敦駐美國大使館在煽動麥卡錫“紅色恐怖”中的作用，倫敦很有可能有意把懷特的名字告訴麥卡錫和胡佛的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目的是削弱美國在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作用。懷特也和許多羅斯福總統周圍的人一樣，顯然不是親英分子。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懷特在至摩根索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如果美國和俄國之間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與英國的政治關係如何無關緊要，巴爾干或遠東發生什麼情況也無關緊要。”

蘇聯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初始參加者，但後來斯大林拒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攻擊懷特為共產黨特務，作用是削弱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的影響。不久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干事必須由歐洲人擔任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律，而且，這一歐洲人最好是一位法國貨幣主義者，如現任總干事康德蘇，在他之前的杰奎·德·拉羅塞爾 (Jacques de Larosiere) 以及在那之前的皮埃爾-鮑爾·施威澤 (Pierre-Paul Schweitzer)，全都來自法國中央銀行。這三位法國中央銀行家自一九六

三年以來就一直控制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只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除外，這五年由荷蘭的貨幣主義者喬漢斯·威特芬 (Johannes Witteveen) 任總干事。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初的使命

最初在一九四五年，所有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使命都是清楚的。它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穩定戰後各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其它任務。美國財政部的工作文件認為美國在布雷頓森林談判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多國基金，以“防止外匯的混亂和貨幣信用體系的崩潰，保障外貿的復蘇，提供巨額資金用于戰後重建、援助和經濟恢復。”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沒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辯論。會議沒有認為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當時的設想是歐洲經濟的恢復將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簡言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開始是為了穩定深受戰爭創傷的歐洲國家的貨幣，在當時這是美國面臨的主要任務。

這一事實是今天需要解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心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時的使命是處理成員國之

間的“臨時”償付結存問題，方式是利用所有成員國提供的基金來援助某一提出資金要求的成員國。貸款用于解決短期問題，必須在五年內全額償還。

一九四五年，美國的希望是迅速恢復歐洲主要國家之間和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當時最直接的情況是，由於戰爭，英國的出口工業癱瘓，生產能力遭到毀壞，無力解決其償付結存中的赤字。若要恢復償付結存的“平衡”，它要麼必須用盡寶貴的外匯儲備，要麼出售英國在海外的資產以獲得資金。

在英國看來，把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儲備集中起來，是解決戰後英國困境的出路。貸款可以使英國有錢購買英國急需的工業進口物資以重開生產和恢復戰爭創傷。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的中心思想是恢復一個國家的償付結存的“平衡”。戰爭摧毀了基本的平衡。對法國和其它深受戰爭之害的歐洲國家來說，這也是主要的考慮。

遭受短期償付結存危機的一個成員國可以向基金申請五年償還的穩定貸款。這可以給該國以時間來恢復受到損害的工業出口能力和重新振興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的是幫助先進成熟的工業國家，如英國和大陸歐洲，因為這些國家有一個多世紀發展現代工業的經驗，熟練的勞工和先進的金融體系。它們反過來又會調節它們與其殖民地的貿易。

## 政策的根本轉變

直到一九七七年，國際貨幣基金一直是作為最後出借機構而向歐洲經合組織成員國提供貸款。其時，最後一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向意大利提供。在此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沒有向任何歐洲經合組織中的工業國家提供過貸款。在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英國一手導演的石油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和其它成員國理應做出合理的決策，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莊嚴地死去”，解散這一機構，因為它與世界經濟的需求不再相關。

但是，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士卻另有打算。

在七十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之後，發展中國家和華沙條約組織中的波蘭及其它國家開始大量向以倫敦為基地的歐洲美元銀行借貸。貸款的目的是應付突然增加的償付結存問題，因為它們的石油進口成本人為地增加了四倍。

倫敦的歐洲美元銀行意識到，這些國家若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緊急援助貸款將受到嚴格的條件

限制，因此，銀行在海外歐洲美元市場籌資向這些國家慷慨地出借了大量私人貸款。這個以倫敦為中心的市場產生於尼克松總統的國務卿基辛格所說的“石油美元回收”，即石油輸出國組織從石油危機中突然積存的大量美元。這些無情的銀行以及其它的銀行把石油出口國存入的美元重新借貸給石油漲價百分之四百的受害國，而這一漲價是基辛格親手促成的。花旗銀行董事長沃特·里斯頓（Walter Wriston）用俏皮話來為大量出借給拉美國家政府的做法圓場：“公司可能破產，但是國家永遠不會。”

石油美元貸款協議都包含有這樣的爆炸性條款：貸款利率將在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基礎上“浮動”。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大幅度提高利率和四月之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爾克決定提高利率之前，這一倫敦的貸款利率看起來還是“合算的”。但到一九七九年底，根據倫敦銀行間拆借利率決定的第三世界歐洲美元貸款的利率，在幾周之內一下突增將近百分之三百，從而點燃了這一“第三世界債務炸彈”。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變成債務警察

正如林登·拉魯旭所預言，由於墨西哥向華盛頓宣布它無法向紐約的銀行償還即將到期的美元貸款，債務炸彈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八月爆發。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個已經是氣息奄奄的戰後重建產物變成了推行殘酷緊縮計劃和強令降低生活水準的執法機構。

在一九八二年墨西哥拖欠債務和由之引發的世界銀行危機之後，倫敦和紐約的銀行採取共同行動對債務國進行掠奪，強迫這些債務國償付（實際上）非法的債務管理服務，這是它們過去做夢都想不到的。在里根總統、沃爾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和紐約債權銀行的堅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了一套新的計劃，對第三世界債務國家申請基金施加嚴厲的條件。

這些條件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員爾雲·弗里德曼（Irving Friedman）設計的，他後來成為花旗銀行的高級主管。弗里德曼在一九八八年底接受採訪時說：“我的想法是用基金作為給這些國家的一種胡蘿卜。你首先要對該國的經濟狀況進行非常認真的檢查，確定產生困難的原因，指出必須進行的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藥方完全一樣：債務國必須削減進口，對本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以保障按美元計

算的債務成倍增長），急劇削減政府對食品和其它必需品的價格補貼，同時開放國民經濟的關鍵部門讓外國勢力佔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之稱作是“自由市場改革”。

自一九八二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謂的“結構調整計劃”就成為私人銀行和債務國達成“債務重組協議”的先決條件。

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墨西哥削減政府開支，取消國家對食品和其它產品的補貼，把比索對美元的比值從一九八二年的一比十二令人不可相信地貶到一九九三年初引入“新”比索時的一比三千。藥品和工業貨物的進口幾乎停止，人民因為必需品匱乏而死亡。與之同時債權銀行仍舊繼續收債。

以倫敦為基地的歐洲債權銀行組織了一個“債權銀行卡特爾”（由於其第一次會議在倫敦郊外的迪其勒公園召開而定名為“迪其勒集團”），它一味地呼籲債務國信守其“責任”，同時又威脅債務國如拒不還債，將從此再也從國外借不到一分錢。這是赤裸裸的威脅，但卻非常起作用。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一九八〇年，一百〇九個發展中國家一年期以上的所有外債（私人外債和國家外債）為四千三百億美元。自一九八〇年以來，這一百〇九個國家向其債權銀行償付了大量債務。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六年僅利息就付了三千二百六十億美元。另外又還本三千三百二十億美元。這樣，這一百〇九個發展中國家在一九八〇到一九八六年間為其最初的四千三百億美元債務償付了六千五百八十億美元。然而，根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方數字，這些國家到一九八六年還欠八千八百二十億美元！原因是簡單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銀行家的算術”：你償還得越多，你也欠得越多。根源是浮動利率債務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對經濟的影響。

自一九八二年開始的債務重組計劃又在第三世界（或更確切地說“欠發達”）債務國的總債務上新增了數千億美元的債務。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下，銀行借給債務國的錢只夠債務國償還利息。按美國的法律，只要保證付利息，銀行就可以把所有債務當作資產入賬。盡管沒有收到一分本錢，銀行也可以據此借錢給他人。

一九八二年之後，銀行沒有向第三世界債務國直接貸款，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初。然而，一

百〇九個國家的美元外債總額急劇膨脹到一九九四年的一萬六千億美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一萬二千億美元。

## 為全球化服務的杠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發生明顯的變化。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 III）在華盛頓招集大通曼哈頓銀行、花旗銀行和其它大國際銀行的主管人員以及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爾克開會。他們確定了這樣一個戰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金和強大的機構壓力，協同力量，不僅要保障原有債務的收取，而且還要對第三世界債務國加上新的要求，如市場自由化，國有工業私有化及其它措施。這就是今天所說的“全球一體化”。

八十年代後期，世界銀行轉變成推動全球工業化過程的一支力量。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和它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文職人員在當時就小心翼翼地提出抗議，反對世界銀行轉變為多國集團向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力市場擴張的殘酷工具。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康德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熱情贊揚當時正全面開展的全球化過程。他說：“本世紀最後幾十年中最重要的發展是全球一體化現象，這將改變我們的經濟生活。”

世界銀行的貸款原先是援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如水壩或電站。現在，世界銀行的貸款被用作為鼓勵性貸款（胡蘿卜），以推動全球一體化和迫使發展中國家向大型跨國集團開放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的貨幣自由兌換條件，意味著海外跨國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從這些國家取走利潤。正是這一關鍵的因素使得索羅斯的“量子共同基金”和其它的海外投機基金誘發了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亞洲貨幣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了推行新全球一體化的機構杠桿。在過去十年中，除非一個債務國首先同意由美國和歐洲的跨國銀行及跨國實業公司提出的條件，否則，它決不會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准”的貸款。這些條件包括：本國貨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開放國內市場，以及據說有助于減少國家預算開支的國有工業全面私有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政策造就了英國廣播公司詹姆斯·摩根 (James Morgan) 所說的“新殖民主義”，即由跨國界的全球銀行和跨國公司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保護下形成的殖民主義。它比以國家勢力為基礎的老牌殖民主義（如上一世紀的英國和法國）更有效率。

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過去十年中採取的取消貸款和經濟壓力政策，發展中國家陷入絕望境地，被迫要求參加這一全球一體化過程，而不惜喪失它們的國家經濟主權。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伸手到前蘇聯國家、波蘭和其它東歐國家，引起災難性的後果。這樣做既有地緣政治目的，也有經濟目的：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拉丁美洲的做法，確保一個虛弱的俄國，讓它像巴爾干半島那樣分裂，在泥濘中掙扎，迫使華沙條約的中央經濟向掠奪和全球化開放。雖然當時大多數華沙條約國家都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但這一個曉問題很快得到解決。

一九九〇年六月，西方七國高峰會議在休斯敦舉行。布什總統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法國總統密特朗的敦促下，同意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面控制蘇聯的經濟改革進程，採取它一九八九年在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做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南斯拉夫的要求，成了造成南斯拉夫國內經濟糾紛的主要因素，正是這一糾紛導致了幾個月之後在巴爾干半島發生的種族滅絕戰爭。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急切地盼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這一進程，以至于免掉蘇聯必須首先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蘇聯得到特殊“聯系會員”的資格，這樣就可以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左右政策。無能的杰夫里·撒克斯 (Jeffrey Sachs) 被招進來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私有化政策，以他著名的“休克療法”作為這一過程的組成部分。

## “以上帝的名義，你走吧！”

在這一時刻，美國國會有充足的理由不僅拒絕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的請求，而且徹底廢除這一機構。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也有一些人反對毀滅性的貨幣主義政策，但是控制權完全掌握在總干事手中。

亞洲已經開始注意到，亞洲危機的結果將像一個倫敦銀行家所說，“把亞洲工業對歐洲工業的競爭威脅至少推遲一代人。”衆所周知，法國工業界對其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尤其擔心，一些人敦促法國國家銀行至少對東亞和香港的貨幣率先發動投機性的攻擊。一位法國銀行家告訴<<EIR>>說：“我所交談過的巴黎銀行家都不擔心亞洲的損失。他們只是說：‘如有必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幫助我們走出困境。’他們看來對康德蘇維護法國利益很有信心。

不管情況是否如此，現實是今天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從頭到腳完全變樣，與羅斯福總統和其他人在一九四四年布雷頓森林設想的機構沒有絲毫共同之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奉行僵硬的貨幣主義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高級美國官員都是“芝加哥學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貨幣主義者，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研究主任、弗里德曼的學生米歇爾·穆沙 (Michael Mussa)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干事、前芝加哥大學教授斯坦利·菲歇爾 (Stanley Fischer) 自一九九〇年以來負責在俄國和東歐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官員約翰·奧德林-斯密 (John Odling-Smeeth) 也是一個貨幣主義分子，他來自撒切爾夫人的英國財政部。

早就應該召開一次新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對現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言，我們要借用三百年前奧烈弗·克勞維爾 (Oliver Cromwell) 對英國議會的指控：“你們坐在這裡一無是處的時間太長了。以上帝的名義，你們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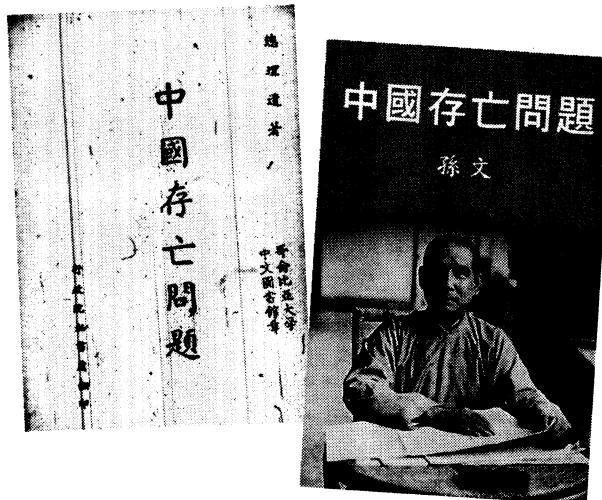
# 孫中山遺作 再度面世

## 《中國存亡問題》

絕版多年席勒學會找出原版重印紀念國父冥誕

【世界日報紐約訊】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公元一九一七年正值第一次大戰初期所寫的一本書《中國存亡問題》，在絕版多年之後，由美國的席勒學會從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中找了出來，重印此書以紀念中山先生一百三十歲冥誕。

據推測《中國存亡問題》未在中國國內重印的原因，可能是中山先生在書中強烈指責英國強迫中國參加一次大戰，在中國當時及其後的環境下缺乏政治上的「正確性」。中山先生認為德國與英國相較，雖對中國有所侵略，但沒有英國嚴重，且無當時英國勾結日本企圖徹底滅亡中國之心，因此在書中反對中國加入一次大戰向德國宣戰。因為中國參加歐戰與英國共同對抗德國，對中國毫無利益可言。孫中山先生且預言在戰後，英國及日本將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進行侵略。孫中山先生在書中也批判了大英帝國的基礎，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之上，其外交政策翻雲覆雨，莫不以大英帝國為優先，力邀中國參戰亦惟如此，英國戰勝後必會與日、俄分裂中國。中山先生的預測，在一戰之後不幸言中，中國又成為英、俄、日的勢力範圍。



在再版的序言中，國際席勒協會 (Schiller Institute) 主席海爾嘉·拉魯旭夫人指出，孫先生的著作對英帝國的分析入木三分，「在與歷史上的任何時間相較，今天的中國如要擺脫眼前的危機，中國之存亡在六十年前即已提出了答案。」

再版的《中國存亡問題》有蔣緯國在感言中說，國父在書中指出，一國之存亡，寄予其國家及其國民獨力不撓的精神，在中山先生一百三十週年冥誕時重印此書，彰顯孫先生的明智，並再啓中國的光明。

有意購買《中國存亡問題》，請寄信：

H.S.D.I., P.O.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中國存亡問題》郵購價格：每本\$6.00 (郵費\$1.5)；五本以上，每本\$5.00 (郵費免)

---

下面這篇文章是一年多以前刊登在美國報刊《新聯邦主義者》(New Federalist) 上的。然而，它和當今的思想家與政策制訂者密切相關，因為它提供了亞伯拉罕·林肯，孫中山與拉魯旭所代表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反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度的思想鬥爭史。這場延續了幾個世紀的鬥爭之結果可能將在21世紀90年代末見分曉。世界將會陷入日益貧困、充滿戰爭和悲慘的境地還是31世紀將近入人類史無前例的新紀元，在文化、經濟、科學上復興，根除貧困，使不論在那裡——非洲、印度或中國誕生的孩子都能充分發展齊天賦能力而有益于人類整體呢？這就是為歐亞大陸橋之成敗而奮鬥的目標所繫。

## 即將來臨的大陸橋文明紀元： 拉魯旭、孫中山與中美新夥伴關係

魏若波 ( Robert Wesser )

“我認為這是人類修養提高在當今應該全力以赴的決定命運的卓越計劃，正如以往那樣，在我們歐亞大陸的兩端，中國之輝耀東方一如歐洲在地球的另一端彪炳輝煌。也許上蒼天意注定了這樣的安排，這樣一來，當最有修養而且相距最遠的民族伸出手臂迎向對方時，處於它們之間的那些民族也會被逐漸引向更好的生活方式。”

——辦·洧·萊布尼茨  
《中國的最新動態·1697年》

1996年5月，在中國北京，中國政府主辦了歷史性的“新歐亞大陸橋區域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現在，就在偉大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做出大陸橋提議三百年之後，歐亞大陸橋的想法是從大陸的另一端傳來。隨著大陸橋的提出，中國政府已經把全球經濟的實體改造引回到在桌面上公開商討，並且已開始與亞洲其它國家合作來在各自的疆域內重建“新絲綢之路”的各條支線。根據中國最新的五年計劃，中國的自然地理將會改變，北京正在大力加速這一大陸橋的整合，並且已開始按照許多項大規模的水利，鐵路與能源

方面的基礎經濟設施計劃進行建設，其目標是在2010年的時候完成（1）。

根據中國新歐亞大陸橋發展促進會會長芮杏文的報告，這一歐亞大陸橋將開創人類文明的第三個紀元，首先是取代古代文明對河網舟楫之便利的仰賴，其次是以現代工業文明對海岸地帶發展的顯著依賴。這一大陸橋經濟新紀元將使我們這個星球的廣大內陸閉鎖地區（目前約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80%）打通而得到大規模開發並且進一步培育人類文明。按照芮杏文的原話：

“不難想象，人類未來的活動空間，將不僅不再為海洋所隔絕，而且也將不再為高寒和荒漠而困擾，橫跨洲際大陸的環球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的暢通，將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繁榮、發達、開闢出遼闊無限新天地，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它將進一步促使區域經濟的互補與合作；科學技術進步的共創與共享；跨洲際能源、交通、通訊網絡的建設與營運；區域環境質量的開發與提高。所有這些將使陸橋經濟漸漸興起，從而人類社會將走向一個新時代——陸橋經濟時代。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個時代。”

腓·浦·萊布尼茨的  
“Novissima Sinica--  
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



腓·浦·萊布尼茨 (1646—1716)

“歷史上，亞歐兩大洲就有悠久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好傳統。遠在2000多年前，古絲綢之路就將兩大洲聯繫到了一起。依托古絲綢之路展開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不僅為人類社會創造輝煌的古代文明起過巨大作用，也對造就近現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至今，它們還是聯繫亞歐兩大洲的一條重要的精神紐帶。新亞歐大陸橋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又稱‘現代絲綢之路’。它必將為擴大現代亞歐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人當前的倡議有力地回應了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孫中山博士在20世紀初期對世界政治的介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孫中山認識到了為“英法協約”帝國主義列強地緣政治利益服務的“和平協約”這一迫在眉睫的危險。在1919年，即凡爾賽會議的同一年，孫中山發佈了中國通過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的整和而發展的綜合計劃行事的另一政策提議。孫將這一政策書取名為《建國方略》並把它設想為預防進一步衝突和佔正統的全球計劃中心內容。

最近時期以來有關開發歐亞大陸的第一個公開綜合提議，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與前美國鴻桶候選人拉魯

旭在1988年10月于當時的西柏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拉魯旭提議，有鑑於蘇聯與經互會國家燃眉之急的經濟崩潰，東德和西德的儘早統一就成為迫切的要求，這是為了給東歐（從波蘭開始）和最終在俄國並繼續往東延伸的極其必要的經濟重建提供必要的先進工業科學基礎。當東歐邊境開放了一年之後，拉魯旭提出一項名稱為巴黎、柏林、維也納“生產三角”的建議，其目的是把這片具有世界最高密度工業與科學實力密度的區域變成交通樞紐和聯成一體的發展走廊來開發東方的一臺發動機（2）。以往在1983年8月，拉魯旭曾發表一項提議為《印度洋太平洋流域50年發展政策》。在這個提議中，拉魯旭列舉了為使地球上這個人口最多地區充份發揮其經濟潛力所需內容衆多的宏偉基礎經濟設施計劃（3）。在蘇聯解體之後，拉魯旭把它的“歐洲三角”提議擴展為把整個歐亞大陸捷運公路，水路以及能源生產與分配這樣一個合為一體的基礎經濟設施計劃群包括在內（4）。

然而，當前，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確實從事于現實的實物經濟發展的主要國家。在以往25年中，建立在各種“自由貿易”與“後工業教條”基礎上的世界

經濟日益“全球化”，事實上已摧毀了美國經濟的整個領域，尤其是在技術要求較高的生產部門。歐洲也由於全球性的“馬稀特痢西瓜式”過程而遭受重創，其工業生產能力比1989年減退了40%。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以所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形式進行的全球化過程，使得他們的工業生產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下跌了70%。

與1996年北京會議清楚闡明的全球未來影響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由倫敦市支持的全球主義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繼續堅持要世界各國消極地服從那一套以在世界歷史上導致了最大投機金融泡沫兒，現在全球人們有目共睹世界處於崩潰過程的“自由貿易”教條！以倫敦市為中心的金融機構與原材料卡特爾，對這一崩潰過程驚恐



孫中山

萬狀，它們正拼其全力嘗試打進無力抵禦的任何弱小國家，而且還在“私有化”與“金融重組”的幌子下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攫取對全世界戰略礦物與原材料的控制。最近對中非人民犯下的大規模滅族大屠殺，在被這一批以倫敦為中心的“全球主義”經營貪婪成性的慾望所支配的世界上，令人恐怖地表明了未來景象（5）。與此類似地，最近由諸如喬石·索羅斯之類

倫敦市馬前卒對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猛烈“襲擊”所造成的破壞，顯示了當全球金融泡沫爆裂時世界各國正被禍水所淹沒。

在這類危機充斥的時期，世界所需要的是有一個正確觀念來引導，以及對這個正確觀念的歷史的知識。顯然，已經失敗的超國家體制政策及其使整個世界“私有化”的可怕計劃必須拋棄，而代之以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以及主權政府的雙邊協議。按照此一精神，我們向讀者介紹孫中山在21世紀初的實業的思想與世界歷史意義，以及當前人們必須為美國政治家林登·拉魯旭的思想而鬥爭的世界歷史意義。惟有這樣做，我們深信，美中新型夥伴關係才能夠迅速成為人類文明得以成功地進入大陸橋紀元之道路，並提供對於那些阻礙其自然發展的力量的一貼解藥。



林登·拉魯旭

## 與帝國相反的大陸橋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倫敦在背後撐腰的那些“全球化”與“私有化”政策是從哪裡來的呢？在他的1996年文獻《現在就得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擺脫協約國！》中，拉魯旭解釋說：

“在21世紀至今為止，全世界各族人民正義事業

的唯一最大障礙，一直是那種無理偏執的英帝國及其幫凶阻撓工業化西歐大陸與太平洋印度洋週邊國家之間建立有效連續經濟合作形式的所謂“地緣政治”決定論。本世紀初俄國與日本之間的那場由英國人挑起的戰爭，在那以後兩次所謂“世界大戰”，以及瀕臨洲際熱核戰爭的曠日持久征逐，都是以英帝國及其附庸的首都為中心的不難看透的“地緣政治利益”所強加給各國人民的。那一被耽誤了的，將比較遼闊而極不發達的中亞地區聯繫起來的做法，是使整個世界失誤經濟恢復與持續增長的自然樞紐。

從法國不列斯特經過象柏林那樣的巨大鐵路中心，直到太平洋與印度洋沿岸的現代鐵路與磁懸浮交通形式，是整個世界實物經濟恢復全球增長率的自然關鍵。這些交通網，在由經過改善和擴大的內陸水路系統以及受交通網限制的發達地區動力生產和輸油管等基礎經濟設施單元來加強之後，為歷史上經濟增長的最大經濟擴展打開了穿越歐亞大陸的後門……”（6）

正如拉魯旭的偉大教導所指出的那樣，合為整體的歐亞大陸這個想法一百多年來一直是英帝國的歷史夢魘，而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英國發動來破壞這條鐵路的。正如《執行策略評論》所獨家刊載的文獻（7）所指出，歐亞大陸整合為一體的現代來源是一群以費城為基地的美國民族主義政黨成員所設想的19世紀全球發展計劃，這些成員在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領導之下，領導了美麗堅和中國去戰勝由英國撐腰的南部聯邦奴隸主扼殺美麗堅共和國的企圖。這個19世紀“大陸橋”提案的帶頭組織者是林肯的主要經濟學家柘茲·惕晉。在1876年，也就是美國立國100週年紀念年，惕晉寫了著名的小冊子《與英國自由貿易相反的商業、基督教與文明…》，這一嘹亮的號角聲宣示了世界經濟發展，單獨指出了英國君主制以鴉片來摧毀中國是那一時代的主要罪惡。

林肯－惕晉民族主義政黨成員成功地把它們的經濟革命傳播到德國，俄國，日本和其他地方，而且在19世紀末創立了世界歷史到那時為止的最大科學與工業強國的聯盟。惕晉在俄國的盟友（該國對於美麗堅和中國在美國內戰中取勝起了及其重要的國際作用）成了西伯利亞鐵路這條“橫貫歐亞大陸”的陸上途徑的建設者。在1880年，以費城為基地的惕晉和果人幹蔓·芨緯是幫助俄國建立現代海軍以對抗英國的太平洋艦隊的關鍵人物，它們甚至已與中國政府協商建立美國式的銀行，以及為了中國的統一與軍事防務而建立鐵路與電訊線！

由於英帝國掠奪世界的強權是建立在它對海上貿易的壟斷及其各“阻扼點”（即直布羅陀，蘇伊士，新加坡等等），19世紀以美國德國為中心（因此顯然是反對英帝國的）歐亞大陸整合與發展計劃之成功執行，會永遠結束英帝國對世界經濟的壓制。在20世紀初，英國的“地緣政治政客”象鉛遷叢瓦·勸善德，顥耜禍福與其它一些人，公開聲明倘若准許這一歐亞大陸的開發，那麼“大西洋週圍的列強，即英荷帝國及其歐洲同盟國將永遠喪失權力。否則這一英帝國的龐大“地緣政治”戰略就將變成所謂“實力政治平衡術”。實際上這意味著處心積慮地操縱各國以及列強各國彼此反對。通過這樣的背信棄義與欺詐，該帝國確實做到了，只要使整個大陸處於不斷的衝突與戰爭之中，就可以容易地破壞開發歐亞大陸的任何鐵路同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代對英國地緣政治戰略最精確的分析是由孫中山做出的。在《中國存亡問題》這一除了我們之外無人知道的文獻中，孫中山揭露了英國的這一龐大戰略；並呼籲北洋政府保持中立和千萬不要加入英國的協約國計劃：

“…要之當其最強之際，英國必聯它國以敵之。及其有它國更強，則又聯之以共敵它國。二世紀間，英國之外交政策，未嘗變也。其以一國為友也，非有誠意之結合，不過利用之以攻擊它國，以友國軍隊為己之佣兵，敵其所愾而已。及乎強敵既挫，惟有友強，則又轉而以友為敵，而英國始終居于使唆之地位。戰則它國任其勞，勝則英國取其利，此則數百年來未嘗變者也。… ”

“無他，英之求友邦，實能為英盡力，今既無力，自然應以其國為英之犧牲。比如飼蠶者，三眠以前，東橐伐桑，昕夕視候，惟恐不逮。孝子之養父母，無以過也。繭抽絲盡，則命燭鼎鑊，骸飽魚鱉，今日英之友邦，皆蠶也，其猶得英之承迎者，絲未盡爾。… ”（8）

到了1917年，英國正是通過孫中山在那時所述，與拉魯旭如今所述的地緣政治手法來操縱引發俄日戰爭和巴爾干衝突的過程。這導致了英國與法國結為協約國，後來又成為英、法、俄三國協約。協約國最後又吸收了腐敗的美國成為成員；在1902年威廉·麥金利總統被英國暗殺後，美國越來越被與英國皇室結盟

的親南部邦聯贊成奴隸制的份子在政治與文化上控制，這一“勢力平衡夢魘達到了它所要求的效應，破壞了歐亞大陸的一體化與開發並且使世界陷入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中。

## 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與 凡爾賽的對比

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孫中山充分認識到，世界和平的唯一真正前途在於19世紀大陸橋設想的復興，這一回是以中國作為歐亞大陸陸上網路復興的新基地，而中國的大規模現代化與工業發展“推動”了大陸橋復興。因此，在世界上作為《建國方略》來傳播的這一計劃，能夠完全挫敗英國對於歐洲亞洲的地緣政治戰略，這一戰略的唯一結果就是加劇衝突與戰爭。所以，孫中山博士在1919年撰寫的《建國方略》就是為著上述目標而在那時提出的原則性國際提案。

孫中山提議的十萬英里鐵路交通網將會把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主權國家聯繫成整體，最終將會包括殖民地化了的南半球。1919年在國際上廣泛傳播的《建國方略》具體地代替了英國授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公約的調解。孫中山計劃的核心是通過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的聯合來開發中國。在《中國之國際開發》的第一項綱領中，孫中山博士優先考慮的是在蒙古平原上修建規模巨大的從東到西的鐵陸網。這一宏偉的計劃，包括了一個與7千英里鐵路相連的華北深水港，將起通向世界其它地區的“門戶”作用，沒有這一門戶中國的內陸就得不到適當的開發。這一宏偉規劃將包括：

(一) 築北方大港于直隸灣。

(二) 建鐵路統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國西北極端。

(三) 殖民蒙古新疆(8—1)。

(四) 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五) 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設立制鐵、煉鋼工廠。

“右列五部，為一計劃，蓋彼此互相關聯，舉其一有以利其余也。北方大港之築，用為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亦繫夫此。”

孫中山博士的“世界”並非僅指那些壟斷了經東太平洋海港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海上強國。孫中山博士把中國與“世界”聯繫起來的觀點，包括了戰略上的向西突進，從而把中國與歐亞大陸的其它部份聯繫起來：

“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蓋將為歐亞鐵路系統之主幹，而中、歐兩陸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絡。由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經此路線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線，將與未來之印度、歐洲線路（即行經伯達，以通達馬斯加斯及海樓府者）聯絡，成一連鎖。將來由吾人所計劃之港，可以直達好望角城。綜觀現在鐵路，于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8—2)”

孫中山博士然後大膽地提議，以他的1919年計劃作為任何戰後國際協議，尤其是新組成的國聯之“拱門的冠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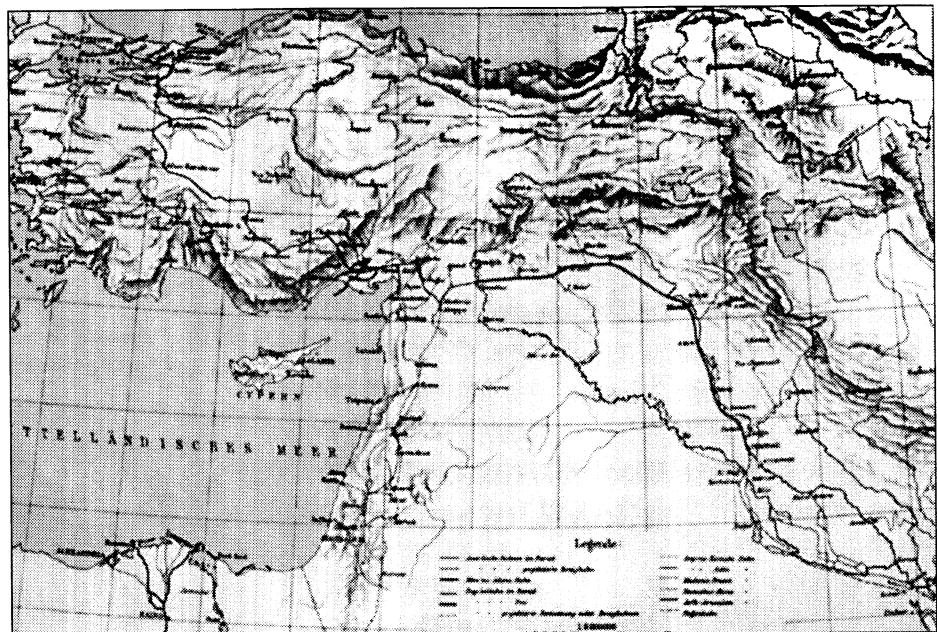
“如使上述規劃果能逐漸舉行，則中國不特可為各國余貨消納之地，實可為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余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不論在中國，亦在全世界，所謂競爭，所謂商戰者，可永不復見矣。

“…自美國工商發達以來，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闢一世界！而參與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尋常之利益，何無益也。且此種國際協助，可使人類博愛之情，益加鞏固，…”

在《建國方略》的某版序言中，孫中山博士向全世界清楚地發出警告，他的提議是為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絕對必需的。

這應該說是與許多近代的看法相反。孫中山驚人的國際提議肯定不是天真地拋入政治真空的一場與世隔絕的烏托邦夢。這裡有必要強調，孫中山在國際上獲得支持的關鍵基礎部份在於一群熱心擁戴林肯（也很親華）的美國愛國者，例如以夏威夷島為傳教基地的佛蘭克·戴蒙牧師。這些美國人與他們的中國盟友幫助

19世紀開工，直到1940年才完成的柏林至巴格達鐵路的東段。原因在於不列顛地緣政治的干擾，其中包括英國人為此而挑起的兩次世界大戰。



孫中山在夏威夷建立了第一個“興中會”，並且與哈晉-林肯的美國十九世紀“大陸橋”國家主義政黨成員有著政治上與歷史上的直接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燈訥博士那一批贊成開發的工業界人士（哈晉等人的19世紀德國盟友界）不再受德皇的戰時限制，又與孫中山博士在上海的朋友們開始進行參預中國宏偉計劃的廣泛討論。與此同時，拉燈訥與妻妾林在1922年5月進行了有關聯合經濟開發的獨立德俄“碰頭晤”協議的談判。在那段時期還有來自美國西部沿海的工業界人士談判了價值30億美元的對俄貿易，以取得在西伯利亞開採煤和石油的特許權為交換條件，來援助俄國的工業化計劃。拉燈訥與其妻妾林在1922年簽訂的獨立“碰頭晤協議”就這樣開啟了一個有可能實現的德、美、俄、中戰後同盟的重組過程，籍以開發俄中兩國，並以重新啓用的洲際鐵路網把這兩國連接起來。這一內容更新了的歐亞大陸橋同盟，被孫中山的中國經濟與中華民族大發展計劃所確定將把大英帝國及其“地緣政治”永遠埋葬。

正如美國被拉到英國這一邊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件事所表明的，也許這一時期最大的悲劇是美國偏離了林肯-哈晉民族主義黨人的全球眼光而趨向腐敗。在孫中山于1919年做出提議的時候，美國的兩大黨都被親英帝國分子接管了，他們企圖利用美國的實力與影響來為英帝國效勞。愛國的總統林肯、嫁妃而得先後被暗殺，最後于1902年危戀·勸脣鬲也被殺，

這幾件事使得美國的總統職位落到了自稱為“秧歌鑼·擦縫僧族愛國者”的薩莫尼·裸相歡手中，他舅舅施沐蘭·部落客曾經是南部邦聯在歐洲秘密特工頭目。裸相歡的繼任者蓋德晤·洧邇巽是英國貴族統治集團的狂熱仰慕者，他的親南部聯邦的政府聽憑恐怖主義的三K黨大規模招募新成員，從而得以在20世紀20年代增加到500萬名成員！因此，洧邇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居然願意與協約國結盟來挽救遭受威脅的英帝國。

這一親英派接管美國外交與經濟政策的程度也許可以從美國商業部對孫中山博士1919年提議所作的官方答復中充份看出。在一封日期為1919年5月（凡爾賽會議後一個月）致孫中山博士的信中，美國商業部長魄·誅得籃仰德對孫中山的答復與一個當今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官僚或會計師的口吻同出一轍：

“…您無疑充份知道，即使要實行您的提議之一小部份都得花費幾十億美元，而其中大部份分項目在今後若干年内都無法支付利息與開支。所以，首先要決定的問題是怎樣償還必須的貸款的利息。中華民國的稅收須承受現有的政府借貸的利息以保證進一步的支付，因此目前看來有必要把發展計劃局限於能充份盈利而吸引私人投資的那些計劃上。”

儘管洧邇巽的總統職位在1920年被渦輪·哈磚所接替，他的政治基礎包括了比較傾向于開發的反英的

美國工業家，但背信棄義與謀殺仍被證明為最終破壞這一有可能實現的歐亞跨洲開發聯盟的有效武器。在1922年夏季，砬葩賈協議簽訂了才幾個月，溫邁·拉燈納就在德國輕易地被人暗殺了。與此同時，有人掀起一場對孫中山博士的大規模攻擊，其目的在把他在南方的政府趕出廣州而且如有可能就殺害他。這場對孫中山的攻擊由軍閥陳炯明發起，得到了匯豐銀行倫敦分行經理殃蘇·怡羅耜的50萬美元財物資助！在這之後不久，哈定總統在美國西岸之行中神秘地死于被宣稱是“食物中毒”的後遺症。由于倫敦唆使凡爾賽條約國做出金融禁制而使德國經濟幾乎崩潰，世界隨之發生大蕭條，于是導致法西斯主義以及正如孫中山博士所警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 中國“固有的智識” 與美國的制度

按照抗這一歷史觀，英明的拉魯旭極力主張美國：在中美當前新的夥伴關係基礎上，重新由美國擔負治理于歐亞大陸開發的強國重任，之極其重要性已變得更清楚。但是，這一新的中美夥伴關係該建立在哪一種更深的基楚上呢？

讓我們更進一層地看一看孫中山的政治經濟思想之哲學基礎。

在孫中山于1923年所作的關於三民主義的系列講演的最後一講中，他滿腔熱情地呼籲全體中國人民，把復興中國“固有的智識”，與美國及歐洲大陸的最高科學成就結合起來，作為現代中華民國的唯一現實基礎。就象萊布尼茨與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那樣，孫中山力主以個人的道德修養作為現代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與使命。從孔夫子的種種總論述中，孫中山選出了《大學》之道：

…中國有什么固有的智識呢？…中國所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家、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所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

在上引同一篇講演中，孫中山闡明了，以這一“固有智識”作為基礎，中國就能迅速吸取西方的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

在1918年12月，孫中山明確地告誡他的革命同志們，個人心智的發展是一切政治的與經濟的發展之基礎：

“兵法有雲：‘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夫國者人之集也，人者心之氣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互人心之振糜。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

“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之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難，行之惟難，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而國事則日行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

很合乎道理的是，孔子以個人道德發展（修養！）作為治國基礎的這一理想，即孫中山的政治與經濟思想的核心。亦完全與食物經濟的傳統“美國制度”辦法合拍，並且與拉魯旭當前將那些思想加以科學促進一致。為了以實例說明這一點，我們從前面已引用過的拉魯旭早在1966年寫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文章中摘引幾句話，儘管我們極力推薦大家閱讀拉魯旭的這篇著作與其他著作之全文：

“…人類脫貧致富並且高於禽獸的最有價值的區別，是唯有人類才能繼承的認識能力，這一能力技能實現又能理解對於我們的宇宙的自然原理的有效公理革命性發現。正是得力於這一點，人類征服宇宙的人均能力成功地得以增加。按照《聖經·創世紀》第1：26—30節所包含的意思，人類的靈魂就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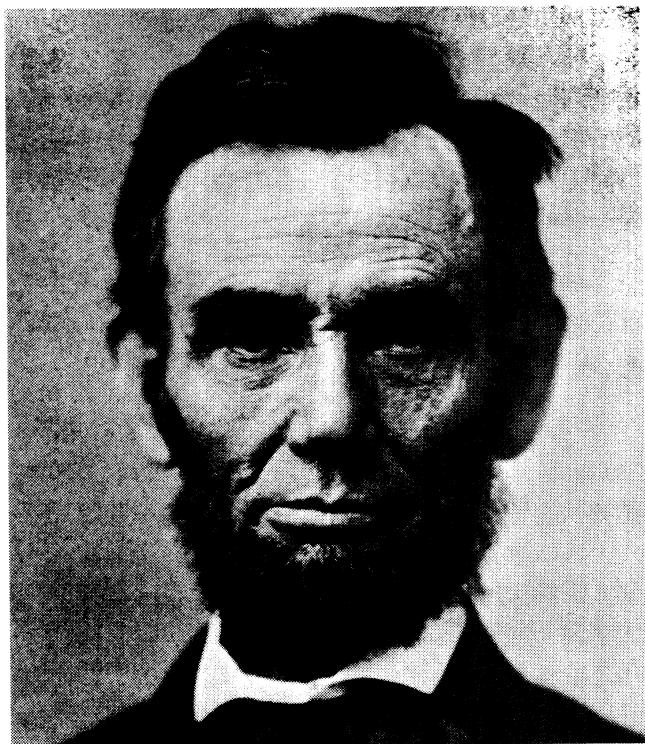
”按基督教定義的人類本性，是物理科學的一個分支即1671—1716年期間由割特佛裡特·萊布尼茨最先提出並進一步加以發展的食物經濟學的主題。在這一科學分支中，我們按照上帝造的地球表面相關面積上每人、每戶和每平方公里的改善率來測量社會中的人口統計成數。對於這些速率的測量連同包含了以勞動生產力的潛在增長為基礎的有效含糊概念，這僅可能的從物理科學與古典藝術形式中的有效公理革命性發現之累積水平推導出來。” 10

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與本杰明·福蘭克林以及第一屆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偉大的德國鐵路設計者佛裡德利希·里斯特，以及上文引述的美國民族主義政黨成員亞伯拉罕林肯—亨利·惕晉相關聯的。美國革命之13個殖民地堅決要求脫離英帝國而獨立，以建立一個獨立自由而且全體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性福”的不可剝奪權利都得到保障的共和國。這樣的國家必須採取絕對單一民族國家（共和國）的主權形式，通過由政府支持的國家銀行貸款，可以促進基礎經濟設施、製造業、採礦業、普遍教育等的發展。按照這一方式，單一民族的主權國家通過創造為社會擴充真正的財富所需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來“增進一般的福利”：不斷增長如拉魯旭教導的潛在增加能夠“篡奪自然力”的人類思維密度。因此，美國的基督教政治經濟制度是作為英國那種建立在高利貸、奴隸制與對殖民地的剝削基礎上的寡頭政治“自由貿易”制度之直接對立物而形成的。

在構成孫中山最著名的學說“三民主義”的一系列演講中，孫中山精確地集中于採用國家來開發民族“勞動生產力”的觀念。根據孫中山博士的說法，中國必須做到：

“第一是交通事業：象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或藏于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辨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

作為孫中山政治哲學核心的三民主義，其實不過是把亞伯拉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這句話所規納的人類政治自由制度化思想重新做了個公式化的表述而已。“民權”主義是確保共和國（或民國）的公民們治理自己的國家，不受英國封建與金繁融貴族政治的奴役之權利與責任。“民族”原則是保障單一民族國家的主權，使之免于遭受外來帝國主義的操縱與支配，或國內的不統一，無自治州權狀態最終導致的內戰。然而，就象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那樣，孫中山也認識到，惟有當廣大民眾脫離了貧困與落後之後，中國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與主權。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國家以其使命而統一起來，通過象國營鐵路建設、農業現代化、國營水利建設、慈善教育等等“龐大的宏偉計劃”來增進“民生”福祉。



亞伯拉罕·林肯

因此孫中山是堅決主張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是徹底的民生主義者。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象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問題，都歸之于民生問題…”

隨著作為民衆“勞動生產力”即作為單一民族的國家之基礎的民生主義的發展，人們所假設的“階級戰爭”之類就可逕人而解。在下面這段話中，孫中山重複了美國制度的觀念，即允許勞動力繁榮時勞資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和諧”：

“…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力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象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步，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緣因，階級戰爭，是社

會當進化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中病症的緣因，使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是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例假。”

孫中山博士所堅決主張的民生主義也使他得以看穿英屬東印度公司僱員橐噠鶩·馬爾薩斯及其偽理論“人口零增長”的欺騙性：

“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T·Malthus），他因為憂慮世界上的人口太多，能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算術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之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實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所以計劃生育就是馬爾薩斯主義。在關於民生的講演中的一段精彩的話中，孫中山證明瞭當我們處理現實發展問題時這一“毒害人心的馬爾薩斯理論”簡直是騙人的：

“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善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仿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附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飢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余，可以供給他國。”

可見人口不應控制。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將未來的美利堅合衆國構想為“全人類的希望之燈塔與自由之

殿堂”。與此類似地，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指導下的現代中國的使命定位對於全人類利益的“神聖天職”：“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國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沒有大利，便有大害。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么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國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都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 爲了新的中美夥伴關係

和75年以前不一樣的情況是：當今的美國幸有拉魯旭所領導的活躍而且有力的政治力量以及他的英明思想存在，並且正在成功地決定著克林頓政府的美中合作政策，以期使美國回到林肯一場的真實經濟發展傳統上。在美國這一偉大戰役的成果將為歐亞大陸的開發確保新的中美夥伴關係。美國制度與拉魯旭的食物經濟科學翻天覆地在性質上接近于孫中山按儒家官典來看待中國及全人類的使命，這導致了思想上的絕妙和諧，能夠很迅速地成為這一新夥伴關係的基礎。孫中山的這一精神在當今中國民運中的再度振興不但已經起了（而且必然繼續會起）必不可少的作用並有助于把新的生命氣息送到美國的靈魂之中。

象聲名狼藉的·眇邇P·荷煙臺那樣地現代僭稱“地緣政治”喉舌，以試圖宣稱在不久之後即將發生的主要東西方衝突將是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對於老老實實地研究過美國真實歷史、孫中山的生平以及當今拉魯旭的偉大著作的那些人來說，荷煙臺先生及另一些人的“分而治之”“實力平衡”政治已經昭然若揭。幸運的是，這樣的實力平衡政治學說與分析在他們所賴以作為前提的腐朽金融制度的重壓下正在崩潰。相反地，我們真誠地相信，如果讓人選擇，絕大多數美國人寧可在通向文明的新大陸橋紀元的道路上與中國的兄弟姊妹們並肩前進；您可是留意孫中山博士在

1912年向率先承認中華民國的美國的公民發表的聲明：《致在美國的中國之友》中的話所體現的警告與智慧：

“我們深深懂得有些執政者，不包括現有的某些國家，會以或多或少的滿意心情來看待這個新國家（中華民國）國內的交戰。他們將會把內戰作為達到他們自己的目地與預謀之步驟而歡迎這場北部與南部各省之間的內戰；就象50年前有人（在某些地區）悄悄贊成那一場可怕的美國內戰。”

“在你們偉大的共和國黑暗的日子裡活著的當今這一代美國人，會回憶起人們心中的感覺——當他們得知外國人希望與祈禱摧毀美利堅合衆國時油然而生的悲戚痛苦心情。

“假如那場戰爭是按南方的觀點戰勝，並且已建立了兩個互相脫離的共和國，難道沒有可能最終建立半打或更多個弱小國家嗎？我相信結果會是那樣；我還相信，當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政治與商業上被分割後，外來者遲早會涉足於把美國變成他們自己的地方。我不相信我的這番話是危言聳聽。要是那樣的話，我就等於未曾讀過歷史、也未曾理智地研究過人們和各個國家。”

“並且我還覺得我們和美利堅共和國一樣有著來自外國的敵人；因此在某些國家首都最受歡迎的聲明是在中國發起叛亂來反對憲政當局。”

“這是一份難以發佈的聲明；但我相信說真話從而全世界可以了解和承認它”。

如今，中國的愛國者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他們的領袖有機會按照拉魯旭的教導引導世界進入大陸橋的新紀元。顯然，一個以儒家思想和孫中山思想為指導全民思想的理論基礎，並且與在拉魯旭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的美國政府結盟的中國，是為打敗我們共同的“外敵”英國人、威尼斯人和聯合國所必須形成的聯盟組合。為了這一目的，我們認為對於中國新領導人最重要的並極力建議的是：進一步更深入地學習和回顧拉魯旭的原著（現在已有日益增多的中文譯本），以及孫中山思想。這一考驗誰是中國的真正的愛國者的偉大的挑戰，已在孫中山博士關於民族主義的第六次講演的最後一段話中得到了最佳的表述：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首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1·有關北京會議的細節，包括佐曝·拉魯旭女士與其他人的講演稿，見EIR，第23卷25期，1996年7月14日《全球戰略通訊》第7卷，第7—8號，1996年8月。

2·通過制定《戰略防衛動議（星球大戰計劃）》來闡明這一過程，拉魯旭本人能起的作用，詳見1996年7月19日《執行策略評論》英文版（EIR），第23卷第9期所刊登的林登·拉魯旭《戰略防衛動議——宏偉的戰略技術觀》一文。在江澤民克林頓于華盛頓舉行會談前夕，拉魯旭發表的演說《美中戰略夥伴關係》也是一篇闡述當前歐亞大陸橋政策及其拉魯旭戰略防衛動議來源的極其重要的文獻！這篇演說詞刊登在EIR1997年10月31日第34期上。

3·見EIR1983年8月刊登的《印度洋太平洋流域50年發展政策》這一著作的中文節譯本現有影印的。

4·關於歐亞大陸橋與這些基礎經濟設施規劃的完整而且內容已更新的詳細敘述，見EIR英文版290頁的報告專輯《歐亞大陸橋——新絲綢之路——世界範圍開發的火車頭》（1997年1月）

5·詳細敘述見《全球戰略通訊》1997年9月第8卷第5期所載〈不許歷史重演！非洲需要通過發展求和平〉一文。

6·《全球戰略通訊》1997年2月第8卷第1期所刊登的〈現在就得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擺脫協約國〉一文。

7·見《執行策略評論》（EIR）1997年5月2日，第24卷第19期所刊載的〈大陸橋：桁肇·惕晉的全球發展規劃〉一文。

8·譯者注：1、殖民=移民；2、以上三地名如今通行的譯法是“巴格達，大馬士革與開羅”

9·這裡重要的是指出，儘管發生了這場可怕的悲劇，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在現代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輝耀史冊。首先是抗擊日本帝國，其次是抗擊英法兩國在亞洲殖民霸權野蠻殘余的戰時中美同盟，尤其從富蘭克林·羅斯福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角色中得到例證。

10·同上引。關於拉魯旭經濟方法的透徹綜述請參閱拉魯旭發表在1995年英文版《執行信息評論》（EIR）上的經濟學教科書《那麼，你想把關於經濟學的一切都學到》（So，You Wish to Learn All about Economics），該書可由EIR社供應，《全球戰略通訊》編輯部亦可以提供該書摘要漢譯本。

# 中美鋼產量對比：兩種理論 兩個結果

理查德·弗利曼 (Richard Freemann)

一九九六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粗鋼生產國，產量為一億零四十萬噸。美國則跌至世界鋼生產國的第三位，產量為九千四百零六十萬噸(日本位居第二)。僅在六年前的一九九〇年，中國粗鋼產量為六千六百三十萬噸。在六年中中國的粗鋼產量增長百分之五十以上。

圖表一對美國和中國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六年的粗鋼產量進行比較。兩國鋼產量的區別完全由於不同的發展理論：在六十年代，美國放棄了亞歷山大好爾頓的發展理論，即由國家控制、資本密集、高能源投入並伴以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放棄了被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稱為“地平線原則”的經濟發展理論，即以未來最科學的經濟發展指導當前決策的原則(見本刊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號，“中國二十一世紀經濟”一文)。取而代之，美國採取了英國後工業化發展政策，造成了高度投機的泡沫經濟。

圖一  
1950—96年的粗鋼產量  
(百萬公噸)

	美國	中國
1950	87.9	0.5
1955	106.2	3.0
1960	90.1	18.0
1965	119.3	13.5
1966	121.7	15.0
1970	119.3	18.0
1973	136.8	24.0
1975	105.8	22.0
1980	101.5	36.0
1985	80.1	49.0
1990	89.7	66.3
1992	84.3	80.9
1994	91.3	92.6
1996	94.6	100.4

Source: 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IISI); EIR

相比之下，在毛澤東時代劇烈動蕩的經濟政策被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所取代後，中國採用了“地平線原則”中更為重要的一些特點，新建了二百個城市和以鐵路為龍頭的發展走廊、港口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大量鋼材。

目前的局面更令人深思的是，在一九五〇年當美國的粗鋼產量仍為八千七百九十萬噸時，中國的粗鋼產量還不足一百萬噸。

## 經濟的指向性

絕對產量本身不足以衡量某國經濟的成功。正如拉魯旭所強調的，以人均、戶均、或每平方公里為基礎表示的產量才是更為精確的衡量標準。

圖表二對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六年間美國和中國的鋼產量進行對比。但是，這種方法會導致曲解，因為

圖二  
1950—96年的人均粗鋼佔有量  
(每人一百公噸)

	美國	中國
1950	0.577	0.0009
1955	0.640	0.0049
1960	0.498	0.0277
1965	0.614	0.0189
1966	0.619	0.0204
1970	0.587	0.0232
1973	0.659	0.0272
1975	0.502	0.0240
1980	0.555	0.0366
1985	0.336	0.0465
1990	0.359	0.0582
1992	0.330	0.0693
1994	0.350	0.0777
1996	0.355	0.0826

Source: IIS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Population Surveys, U.S.A. and China.

美國的起點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更為工業化的經濟。雖然如此，圖表二仍然揭示了在過去四十五年間所發生的變化的性質。在一九五〇年，美國人均鋼產量是中國的六百四十倍，或將近三個數量級。而今天，美國人均鋼產量僅是中國的四點三倍，不足一個數量級，而且差距還在迅速縮小。

圖表二的重要意義并不在其簡單地表示了人均鋼產量的絕對數字，而是人均鋼產量變化的速度，揭示了經濟發展的指向性，比如，經濟是否在以實物經濟為基礎健康地發展。

圖表三將人均粗鋼產量指數化，取美國和中國一九六六年人均粗鋼產量，分別為人均0.619噸和0.0204噸，并使之在指數表中等于壹，(一九九六年可能是美國經濟“正常”運轉的最後一年)。所有其他年度均根據一九六六年人均粗鋼產量基準指數化，分別以指數形式表示。

這種方法揭示性很強。與一九六六年人均粗鋼產量水平相比，美國今天粗鋼生產比一九六六年水平低百分之四十三。而中國卻以高出一九六六年人均水平四倍的速度進行生產。

相比之下，美國目前的鋼生產效率較高；制造同等數量的制成鋼所需粗鋼數量較少。

圖三  
人均鋼鐵佔有量  
(1966=1)

	美國	中國
1950	0.93	0.04
1955	1.03	0.24
1960	0.81	1.36
1966	1.00	1.00
1970	0.95	1.08
1973	1.06	1.33
1975	0.81	1.17
1980	0.73	1.79
1985	0.54	2.28
1990	0.58	2.85
1992	0.53	3.40
1994	0.57	3.81
1996	0.57	4.05

Source: *EIR*

然而美中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發展理論：例如，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中沒有建造任何新的核電站並放棄了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是在退步。而中國在遵循“地平線原則”，即循漢密爾頓·林肯傳統的發展模型的範圍內，正在向前發展。

# 加入席勒學會復興世界文明！

席勒學會會員登記表

- \$1,000 終生會員(含二年全球策略信息) H.S.D.I.
  - \$ 500 支持會員(含二年全球策略信息) P.O. Box 58
  - \$ 100 特別會員(含二年全球策略信息) Ridgefield Park, NJ, USA
  - \$ 35 普通會員(含一年全球策略信息) Tel: (201)-641-8858  
Fax: (201) 641-0453

姓  
名\_\_\_\_\_  
街  
道\_\_\_\_\_  
州  
名\_\_\_\_\_ 區  
電  
話\_\_\_\_\_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

# 土庫曼 伊朗天然氣管道： 歐亞大陸橋建設之進展

穆麗爾 · 米拉克 · 魏斯巴赫 (Muriel Mirak-Weissbach)

二月二十九日，伊朗總統賽依德·潞躉·卡塔米 (Sed Mohammad Khatami) 與土庫曼總統斯巴姆拉德·尼亞佐夫 (Saparmurad Niyazov) 在西土庫曼扭動一巨大閥門，開啓了由這一中亞共和國向伊朗輸送天然氣的管道。這首條不經俄羅斯領土，由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向外輸送天然氣的管道被西方新聞界歡呼為對莫斯科控制該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的致命一擊。同樣，由於該管道與伊朗相接，此事也被認為使華盛頓的外交政策野心受挫，該政策狹義上被定義為避免伊朗染指該地區。

事實上，這條管道標誌著朝著歐亞大陸橋建設從而調動亞洲大陸經濟潛力方向邁出的雖小，但戰略意義重大的一步。這一開啓天然氣管道的儀式在某些程度上可與一九九六年五月由伊朗的馬什哈德，經撒拉克斯至土庫曼的塔貢鐵路通車典禮相比。該鐵路盡管距離不長，卻全程接通了洲際鐵路交通，使從中國的連雲港經中亞、伊朗、土耳其直至鹿特丹的鐵路交通成為可能。在這兩個世紀項目中，交通紐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土庫曼和伊朗的作用。

這條天然氣管道長二百公里(一百二十英里)，將由西土庫曼的科培芝向伊朗庫爾德地區的庫德科依供氣。建設費用為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全部由伊朗提供，并刻意杜絕從國外金融機構如國際貿易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融資。土庫曼最初每年將向伊朗出口三十億立方米的天然氣，隨後將增至一百二十億立方米。最初三年的天然氣出口將用來支付伊朗對該管道建設的出資。

幾天前，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伊朗、土庫曼和土耳其的能源部長們在德黑蘭伊朗 土庫曼聯合經濟委員會就一項天然氣合作項目進行了最後階段的談判。根據隨後簽署的協議草案，計劃建造一條一千五百公里長的天然氣管道，由土庫曼經伊朗和土耳其向歐洲

供氣。這一總投資十六億美元的項目每日將能夠輸送九十萬立方米的天然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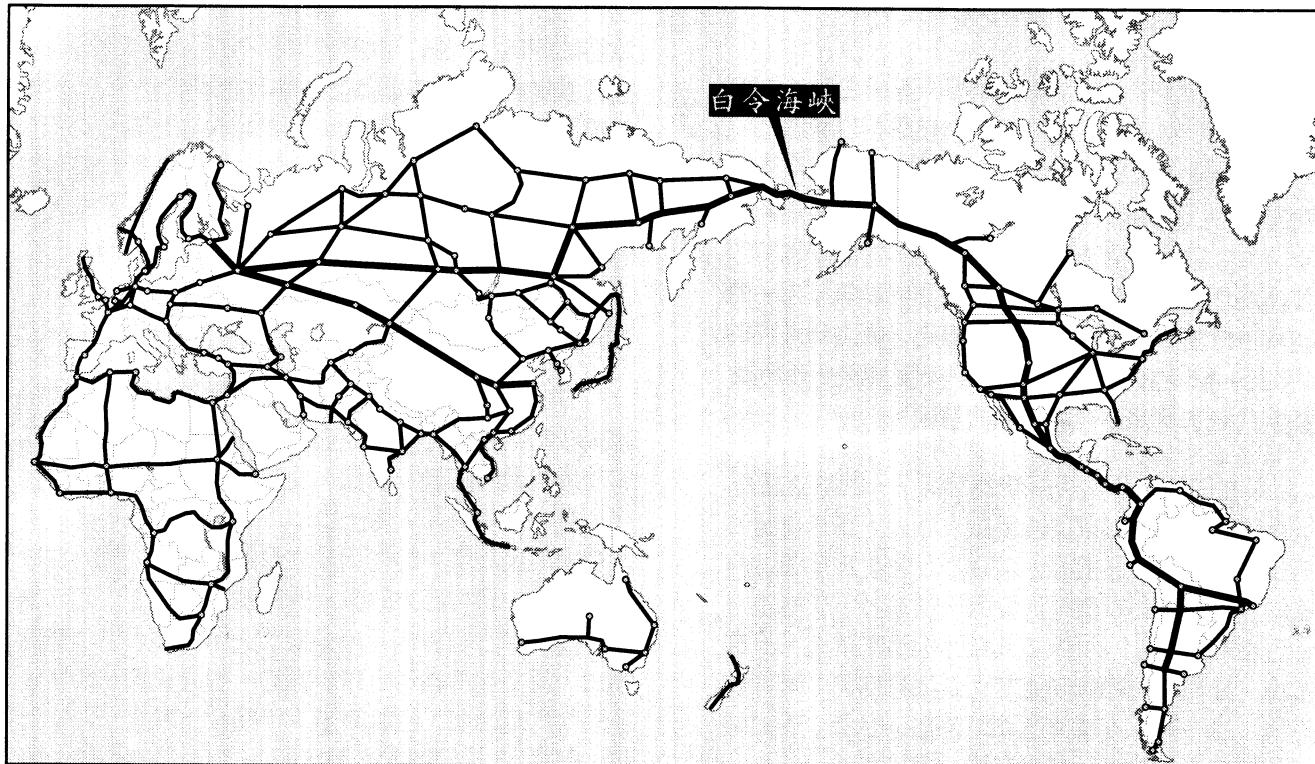
此外，土耳其總理馬蘇特依爾馬茲和土庫曼還敲定並簽署了一項雙邊協議。根據該協議，土耳其將從二000年開始每年向土庫曼購買一百五十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據有線新聞報道：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輸送天然氣的方式：既可通過穿越伊朗境內的天然氣管道，又可通過里海海底的天然氣管道。主張採取後一種方式的是熱衷於排除伊朗參與的各種勢力，但這種方式比經伊朗的陸上管道費用高出十億美元之多。伊朗已建成聯接土庫曼和伊朗北部段管道這一事實意味著經伊朗的陸上管道這一方式更具現實可能。

最後，伊朗和土庫曼總統還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一光纜纖維通訊網絡項目的建成剪了彩。這項工程全長七百一十五公里，是歐亞通訊工程的一部分。該項工程是一全長一萬七千公里通訊網絡，聯接上海和法蘭克福。

## 經濟現實，地緣政治運作

因此，在一九九七年底簽署的一系列協議和開通的工程項目為歐亞大陸橋的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西方新聞界將這些令人振奮的事件放在為謀求地區霸權而操縱地緣政治的背景下加以反映並不足為怪。操縱《華爾街日報》和《倫敦時報》等報刊的金融和政治集團的思維方式屬於英國地緣政治學派，他們從傳統的英帝國利益出發看待歐亞大陸的發展，即如何阻止這種合作的趨勢，以夷治夷並從中漁利，攫取該地區的自然資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新聞界對上述天然氣管道開通的報道集中在該管道繞開俄羅斯、以及該管道事實上無視臭名昭著的達馬托法案代表

## 苦派的全球鐵路網略圖



的對伊朗的制裁機制，即禁止與伊朗開展大規模經濟合作等事實上。

截至目前，在歐洲唯一客觀報道這一事件的是《漢德爾斯布萊特》，一家德國的經濟報刊。該報強調了這一簡單的事實，即這條天然氣管道標志著對土庫曼的拯救，使其自一九九一年獨立以來首次有機會出口其天然氣和石油。以前，土庫曼唯一的出口途徑是通過俄羅斯向高加索和烏克蘭出口。這樣產生的問題並非與地緣政治有關，而是純濟的。由於前蘇聯解體後貿易和生產的崩潰，以及隨後國際幣基金組織的休克療法對前共黨國家經濟的摧毀，接受土庫曼出口天然氣的國家無法支付其負債。因此，一九九七年三月，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停止了向上述國家提天然氣。截止那時，對土庫曼的欠債已超過十億美元，其中一半來自俄羅斯。土庫曼的然氣生產急劇下跌，由一九八九年的八百九十六億立方米跌至一九九六年的二百六十億方米和一九九七年前九個月的一百三十九億立方米，比前一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四十八點六。

正如一位土庫曼官員近來所說，該天然管道的建設對土庫曼來說“事關生死”。土曼一直在多方探討建設天然氣管道的可能，進入世界市場。這些嘗試包括由加利福尼亞的優能公司(UNOCAL)和沙特三角公司(SAUDI DELTA)與阿富汗的塔里班組織達成的協議，設一條由土庫曼經阿富汗，進入巴基斯坦和際市場的輸氣管道。同時，土庫曼政府也一在與土耳其政府探討沿里海鋪設管道的可能總而言之，對土庫曼來說，壓倒一切的考慮找到利用其巨大的天然氣和石油財富的方式土庫曼是世界上第四大天然氣生產國，擁有十三至二十一萬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儲量。

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使土庫曼和其他于一九九一年獨立的中亞共和國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財富。他們是否將重蹈一些阿拉伯海灣國家的悲劇性復轍，以原材料出口的財富養富一小撮寡頭統治集團，并將經濟活動限制在出賣原始資源範圍內。或者，這些國家可能利用這些財富發展以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如交通、能源、水資源治理、教育、衛生為基礎的全面協調的國民經濟。

# 從蘇聯體制到 獨立的國民經濟

在中亞建設獨立的國民經濟絕非無用之舉。所涉及的五個中亞共和國一直被前蘇聯視為其經濟部門，而非國家經濟。這些共和國過去的功能是從其單作的農業部門出口原材料或產品，如棉花。國民生活需要的產品和工業品必須通過進口。因此，當前蘇聯解體以及經互會貿易體制崩潰後，這些國家就象原來一體化經濟中單獨的經濟部門從此被隔絕，失去與外界的聯繫而一蹶不振。上述關於土庫曼貿易和生產崩潰的數字代表了其他中亞共和國的情況。

正是在這種災難性的停滯的情況下，國際幣基金組織提議幫助這些國家從油鍋跳入烈火，要求全面的私有化和幣的自由兌換等。這樣做意味著為掠奪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和取消其社會保險體系打下了基礎。出于合理的原因，一些中亞共和國拒絕了這些“改革”措施。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就拒絕使其本幣可自由兌換，這一要求不僅來自國際幣基金組織，正如德國東方研究所的雷納·弗雷泰格·威明豪斯(Rainer Freitag-Wirminghaus)在阿什哈巴德會議上所指出的，歐洲聯盟亦明確表示伙伴與合作條約(PCA)的三個先決條件是：堅持民主、尊重人權和本幣可自由兌換。由於烏茲別克和土庫曼均未接受這一條件，兩國都未得到國際幣基金組織的貸款。關於要求這些國家開放經濟，允許外資進入購並企業，烏茲別克總統于一九九七年三月發布法令，規定百分之二十五的私有化企業可以出售給境外投資者。這一比例與國際幣基金組織所希望的相去甚遠。此外，該法令規定不允許原材料或基礎設施部門進行私有化。關於與外國公司合資的規定也很嚴格。政府在合資公司中的股份必須超過百

分之五十，而且對外商和利潤分配設立了限定性的條件。

同樣，在土庫曼，尼亞佐夫總統在提交計劃允許三百七十五個大型國有企業中的三百三十個進行私有改造的同時，確保了政府對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氣)和運輸基礎設施(鐵路和航空)等戰略部門的控制。土庫曼還保持了其社會保險體系，為超過四百萬人口提供無償服務，包括提供電、氣、水、鹽、教育和醫療服務。在吉爾吉斯斯坦，由於國家對退休、失業等人員的援助已被取消，存在著嚴重社會動盪的危險。

## 重建絲綢之路

中亞共和國中那些最堅決地抵制採取國際幣基金組織政策的國家對其在歐亞大陸橋中獨特的經濟作用有著最清醒的認識。例如，土庫曼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司司長，阿曼德耶夫博士(Dr.A.N.Amandurdyev)曾就土庫曼在地區發展中的作用發表演講。他說，他的國家位於聯接中國和西方的偉大的絲綢之路之上，因而構成聯接東西方的橋梁。阿曼德耶夫博士擴大了中亞的概念，使之包括經濟合作組織的十個成員國，即該組織的共同創始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以及五個中亞共和國。阿曼德耶夫博士表示：“土庫曼非常重視發展鐵路、公路、海洋和航空運輸、電子通訊和其他通訊手段以便盡快融入中亞和世界經濟體系”。他宣布，“在鐵路運輸方面，土庫曼計劃建設二千公里鐵路，其總長相當於自一八八零年來的一百年中建造鐵路和總和。此外，土庫曼正利用世界最新技術成果建設其鐵路網絡，包括網絡電氣化。按照中亞地區許多政府的時興語言，阿德耶夫博士說，“因此，土庫曼已將重建絲綢之路作為國家對外經濟戰略中有機的部分”。

新近開通的土庫曼天然氣管道將會幫助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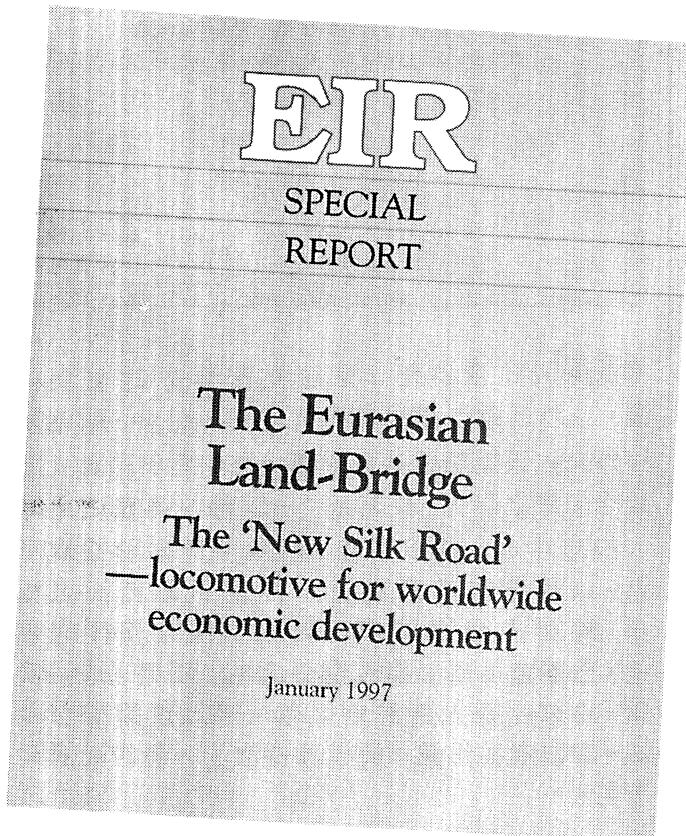
## 《主管戰略評論》報告

# 亞歐大陸橋“新絲綢之路” ——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一九九七年二月五號的《主管戰略評論》(EIR)發表了一條消息。其標題為“亞歐大陸橋——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主管戰略評論是一份由美國政治和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創辦的周刊。該刊強烈要求白宮將席勒學會的建設亞歐大陸橋的建議作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

這篇298頁的報告吸引了世界上所有的主管戰略評論新聞局里的專家。它代表了一個能使全球迅速工業化的包羅萬象的偉大計劃，其中居首位的是關於運輸、通訊、能源和水源基本建設等宏偉計劃。它是一個瞄準了把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生活水平都躍昇到當今所謂工業國家享受之高度以上的、複雜的和迅猛地橫掃一切的全球工業劃的設想。該報告特別詳細地披露了中國政府在“新絲綢之路”亞歐大陸橋上的角色並認為北京已因其有一萬個主要基本建設和經濟發展方案的國家計劃而接近領導的邊緣。這篇報告包括三打發展規劃的原件地圖和以四種顏色為特征的亞歐大陸橋發展走廊材料，並且包括大量附加的圖片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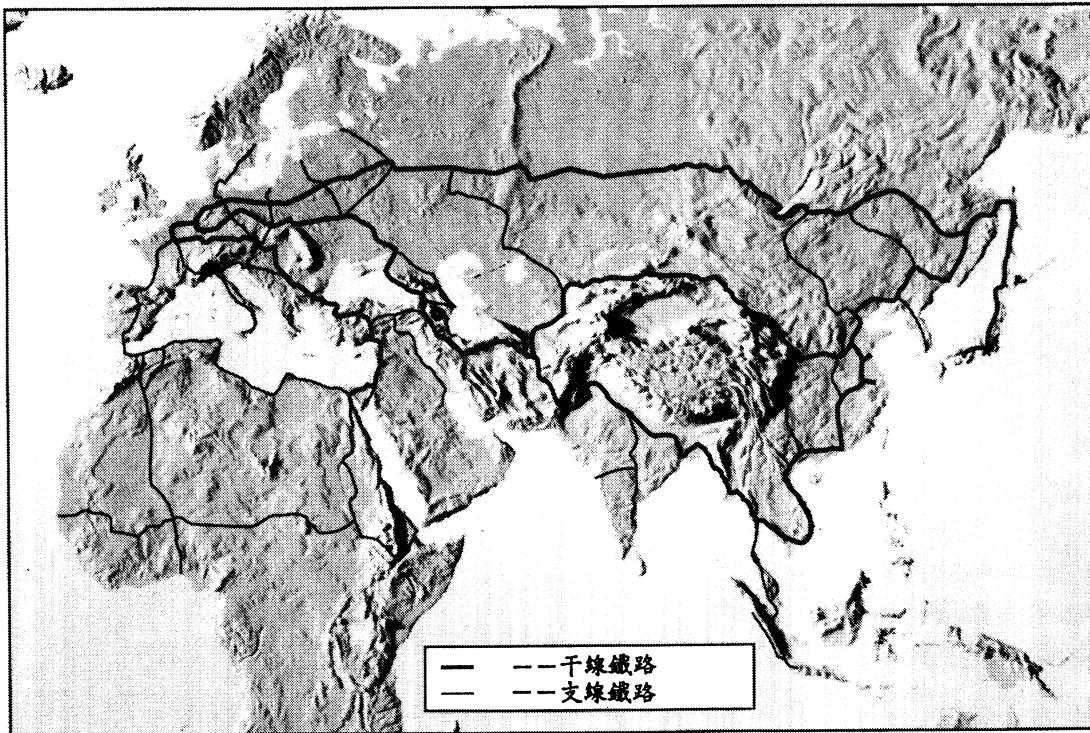
這其實也不是甚麼新點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中國之父孫中山博士就有一整套一模一樣的主意。孫博士認識到，惟有具備大規模地把中國建成一個普遍現代化和以發展工業作為開發新的發展亞歐大陸現代工業基地的能



歐亞大陸橋特別報告

力，才能保證將來的世界和平。在1919年出的《建國方略》書中，孫博士詳論了中國必須建設的基礎經濟設施項目以為發展之需要，他將其

# 亞歐大陸橋“新絲綢之路”



歐亞大陸橋上  
的高速磁浮  
鐵路走廊。

言之。則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概將為歐亞鐵路統繫之主幹，而中、歐兩陸與外交政策戰略相結合並延伸進中國與亞歐大陸其他國家之聯繫。孫寫道：“以‘地位適宜’之原則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絡。由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以經此路線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線，將與未來之印度、歐洲線路（及行經伯達，已通達馬斯加斯及海樓府者）聯絡，成一連鎖。將來由吾人所計劃之港，可以直達好望角城。綜觀現在鐵路，於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

本報告之主要部分安排的是拉魯旭的實體經濟概念以及給中東、非洲和其他地區的國家領導人們設計的發展亞歐大陸橋、中歐“生產三角區”等計劃。該報告包括如下章節：\*高科技基建發展走廊；\*深陷困境的中國基本建設項目；\*歐洲：“生產三角區”；\*俄國：東西方之間的北方橋樑；\*世界金融總危機及其唯一出路：實體經濟學基本原則；\*亞歐大陸橋與美國

的經濟重建；等等。英帝國的宿敵對以“新絲綢之路”為代表的前景之宿怨，也是獨立的一大章，其中有很長一節涉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對於不發達國家戰後政策上之生死搏鬥。

這本新的報告已用德、英兩種文字印發。每本售價 \$ 200。

含96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會議上之重要發言的小冊子只需 \$ 8 (包括郵費)。

請將訂單寄往或傳真到：

H.S.D.I

Att.: Leni Rubinstein

P.O.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 U.S.A

Fax: (201) 641-0453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

# 致美國總統的公開信

# 立即爲林登·拉魯旭平反！

1994年元月26，作為一名在聯邦監獄中關押了5年之久的政治犯，美國思想家和實物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先生獲假釋出獄。

他這有限的自由是由一個空前大的國際聲援運動促成的。約有一百位著名的美國法律專家作為「法庭之友」向法院請求時稱此案為「對所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公民之威脅」。此件已呈遞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美國政府機構和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毫不誇張地說，近千名國會議員、當選官員以及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藝術家、科學家和人權鬥士要求終止對拉魯旭的不公正的監禁。數百人參加請願團到華盛頓特區議會走廊要求歸還拉魯旭的自由。

歷經5年之後林登·拉魯旭才獲得了假釋。問題在於這個「莫須有」的罪名仍然沒有答案。不僅是一個無辜者被陷害、冤判和屈禁了5年，而是現在就有6卷記錄著無可非議的事實之檔案擺在那兒，主要包括政府文件和特派官員們的供詞等。這說明美國政府完全清楚從1979年直到今天這段期間，林登·拉魯旭及其同案被告們是受污陷迫害的正派人！這也證明了當時的政府是故意污告、冤判和無理監禁拉魯旭及其助手。因為當權派們明知佛吉尼亞瑞齊滿聯邦上訴法院一部分公開卷宗裡有這批人完全無罪的記錄。

時至今日，不僅美國聯邦法院和司法部未能糾正這起假案，而且，當這些至關重要的證明材料無人理睬地冷置在角落裡接灰塵時，5位林登·拉魯旭的助手仍在監牢裡打熬那長達數十年的漫漫刑期。

我們這些簽名者只好以法律的名義採取行動。請求您，總統先生、總檢察官監納特·芮挪以及聯邦議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採取任何的或所有的必要措施以保證盡快地、徹底地為林登·拉魯旭及其助手們平反昭雪！即使這件事失敗了，對林登·拉魯旭的名譽也倒沒有多大的損害。反正他已經為自己的清白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但卻會是美國司法系統和國家憲法的恥辱。因為在此陰謀事件之前的二百多年裡這部憲法一直被認為是自由和正義的象徵。

(在把我的名字添在下面的時候我聲明：我的簽字只能以附帶識別的目的與此信一塊出現在報刊或廣告上。)

Name 姓名	Address 地址	Affiliation 團體

# 全球策略信息

第六卷第十一期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克林頓的外交政策革命  
為何說貝爾格森獎得主多是江湖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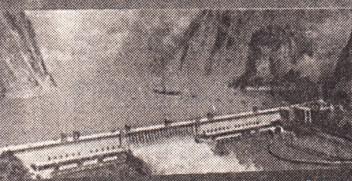


#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三期一九九六年三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你想學習經濟學嗎？》（第二章）

林登·拉魯什及其實物經濟學



#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七、八合期一九九六年八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歐亞經濟發展大計劃出臺

海爾嘉·拉魯什25年後再次訪華談歐亞經濟發展  
新亞歐大陸橋區域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發言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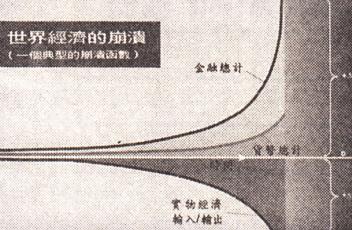


# 全球策略信息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中美恢復關係：贏得進步快步伐  
新亞洲主義也可以改變未來  
我們在美國：一個中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

世界金融經濟的崩潰酒



#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一、二合期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古典概念

勃拉姆斯之為人，為師，且為藝術家

新絲綢之路：二十一世紀的



# 全球策略信息

第六卷第九期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結束「特殊關係」——克林頓描绘英國人  
英國地緣政治的歷史與今天



## Table of Contents

Vol. 9, No. 1 March 1998

- The coming Landbridge era of civilization: Lyndon LaRouche, Sun Yat-sen and a new Chinese-American partnership
- New phase of financial blowout

# 全球策略信息訂閱單

\$35 訂閱二年

\$20 訂閱一年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_\_\_\_\_  
\_\_\_\_\_

H.S.D.I.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Tel: (201)-641-8858  
Fax: (201)-641-0453

Telephone: \_\_\_\_\_

責任編輯： 陸琳灘  
Leni Rubinstein

歡迎電詢，寫信，投稿，或購買書刊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